



《学点历史》丛书

#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 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

叶前编写



《学点历史》丛书

**马克思恩格斯  
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

叶前编写

人 民 出 版 社

《学点历史》丛书  
马克思恩格斯  
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  
叶前编写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12,000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276 定价 0.42 元

Coop 5.6/36

111

## 恩格斯语录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儒家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 目 录

一、引言 .....	( 1 )
二、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	( 10 )
反对魏特林主义 .....	( 11 )
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 .....	( 14 )
恩格斯在巴黎的斗争 .....	( 17 )
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经济理论 .....	( 20 )
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 .....	( 25 )
三、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 策略路线 .....	( 30 )
批判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 .....	( 31 )
批判波尔恩的右倾机会主义 .....	( 35 )
批判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	( 38 )
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主义 .....	( 42 )
四、反对拉萨尔主义.....	( 48 )
关于农民战争的论争 .....	( 50 )
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论争 .....	( 53 )

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 .....	( 56 )
揭露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勾结 .....	( 62 )
积极支持先进工人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	( 66 )
<b>五、反对蒲鲁东主义 .....</b>	<b>( 73 )</b>
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	( 74 )
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反对革命斗争、鼓吹社会改良的谬论 .....	( 76 )
粉碎蒲鲁东主义者妄图永远保存私有制的反动主张 .....	( 82 )
反对蒲鲁东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企图 .....	( 86 )
<b>六、反对英国工联主义 .....</b>	<b>( 90 )</b>
批判工联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 .....	( 91 )
在选举改革问题上的斗争 .....	( 97 )
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斗争 .....	( 101 )
关于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	( 110 )
<b>七、反对巴枯宁主义 .....</b>	<b>( 118 )</b>
一个混入国际内部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	( 121 )
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和巴枯宁派的猖狂活动 .....	( 125 )
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发展和胜利 .....	( 131 )



海牙代表大会后的斗争 .....	( 138 )
<b>八、反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 .....</b>	<b>( 144 )</b>
反对妥协投降,清算拉萨尔主义 .....	( 145 )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	( 155 )
反对“非常法”时期的机会主义 .....	( 165 )
<b>九、反对美、英、法等国工人运动中的错误</b>	
<b>倾向 .....</b>	<b>( 178 )</b>
反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	( 179 )
反对法国“可能派”的机会主义 .....	( 184 )
反对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和“费边社”的改良主义 .....	( 192 )
<b>十、第二国际创立初期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b>	<b>( 200 )</b>
反对机会主义者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	( 200 )
反对德国党内的“青年派” .....	( 205 )
反对德国党内的“议会主义” .....	( 208 )
反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	( 216 )

## 一、引 言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和他在“一生中对付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经常不断的、激烈的路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当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总结工人群众斗争的经验，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的时候，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正如列宁所说：“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要把工人运动引上正确的胜利的革命道路，就需

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清除那些反对阶级斗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派别对工人群众的毒害和影响。尽管当时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极少数革命共产主义者，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信自己的学说是唯一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理论武器。因此，他们敢于藐视那些在群众中暂时拥有一批信徒的魏特林、蒲鲁东等“大人物”，敢于藐视他们的一时看来似乎不可动摇的“理论”。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接着，他们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先后对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封建的社会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摆脱了冒牌社会主义思潮的束缚，成功地把正义者同盟改造为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在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型制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完整的、系统的阐述，而且对他们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作了精辟的总结。

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当时德国经济、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科学分

析，迅速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路线。在革命进程中，他们不仅领导德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同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批判了以哥特沙克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和以波尔恩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领导德国革命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积极指导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人民的斗争，着重批判了在法国工人群众中颇具影响的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被迫流亡伦敦。在那里，他们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恢复和重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了同盟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和策略，并同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冒险主义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20 页）这次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比正确，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经验的总结，又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宝库。

整个五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着巨大的理论活动。特别是马克思，不顾反动势力的疯狂迫害，也不顾长期流亡生活造

成的极端贫困和各种疾病的无情折磨，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坚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光辉结晶就是1867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六十年代初期，欧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重新开始高涨。1864年9月，马克思在伦敦亲手创立了第一国际，“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并且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在各国工人群众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们不仅阻碍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以便把它变成实行某种社会改良的方案或实现少数人的政治野心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在国际总委员会中，以及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商谈中，对此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坚决反对了蒲鲁东主义、英国工联主义，并且继续进行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而特别激烈、特别复杂，直接关系到第一国际生死存亡的，是对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巴枯宁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长期斗争。在整个第一国际期间，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上

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就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这些斗争的胜利，保证了第一国际始终沿着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推动了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

1871年3月，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支持、高度评价了法国革命工人所进行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无情地批驳了那些跟在资产阶级反动派后面疯狂攻击公社的叛徒们，捍卫了公社的革命荣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把法国工人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变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共同的宝贵财富。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欧美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在各自的民族国家内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各国工人领袖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加强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积极开展建党活动。由于普法战争已使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德

国，而且早在 1869 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帮助德国先进工人在与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他们把培育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重点。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在与拉萨派别合并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投降倾向，并且彻底清算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恩格斯还对混入德国工人运动、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俾斯麦反动政府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他们注意反对了党内以莫斯特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同时着重同以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展了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一切，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壮大。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到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2 页）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欧美各个先进国家先后建立起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批判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与教

条主义，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内的“可能派”机会主义，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英国“费边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各国工人政党作了巨大的努力。

自从187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时起，马克思就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的研究和写作。因此，同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实际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恩格斯承担的。1883年马克思不幸逝世之后，恩格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与他共同开创的伟大事业，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这种艰巨、复杂的斗争。他在同以“可能派”为中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创立了第二国际。他大力支持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并且揭露了它在德国党内的变种“青年派”小集团。他以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战斗，沉重打击了“非常法”废除之后在德国党内出现的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议会主义”。他无情地批判了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直到1895年逝世时为止，他从未停止过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

半个世纪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派别，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并不一样，但是，所有这些斗争，毫



无例外地都是革命无产阶级同混入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候起，这种路线斗争始终存在着。列宁反对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的斗争，当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与组织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继续。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不断斗争，才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的。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时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高度的斗争艺术，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树立了伟大的典范。当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损害，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遭到歪曲的时候，不管自己处于怎样艰难困苦的地位，也不管敌人表面上如何强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高利益出发，以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且一直坚持到胜利。在每一次斗争中，他们都以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彻底地戳穿敌人五光十色的漂亮言辞的伪装，使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代表

的阶级利益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锐利武器透彻地揭示其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本质。这样，他们始终都能准确地击中要害，置敌于死命。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虽然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得体无完肤，并且为各国的先进工人所唾弃；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它们总是企图借尸还魂。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拉萨尔主义等各种假社会主义的阴魂。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包括刘少奇、林彪之流，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时，除了乞灵于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外，也总是拣起国际上老机会主义者用过的破烂武器，甚至他们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而大搞分裂活动、大搞阴谋诡计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也与其外国祖师爷不无相似之处。因此，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学习他们在这些斗争中所写的许多光辉著作，对于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是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 二、为建立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而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先进国家已取得统治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和集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各国工人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武装和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勇敢地肩负起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还远远没有取得统治的地位；真正信仰它的只不过是极少数最先进的革命共产主义者。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共同特点的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并用种种漂亮、动听的言辞宣扬“正义”、“平等”、“权利”等抽象的观念，因而在工人群众中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严重地阻碍着科学共产主

义的传播和群众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面对着泛滥于各国工人运动中的这种错误潮流，掌握着无产阶级革命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英雄气概，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 反对魏特林主义

第一个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决定性打击的是魏特林主义。

威廉·魏特林(1808—1871)是德国裁缝工人出身的理论家。他虽然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建立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他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空想的，因而荒谬地“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5页）他虽然承认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是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少数流氓无产者的自发的密谋暴动。他反对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他还竭力鼓吹兴办公共食堂等改

良主义的试验，后来，他甚至宣扬人们应该恭恭敬敬地等待“救世主”的降临。总的来说，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之前，魏特林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初期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在此以后，它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继续发展的障碍了。

1846年初，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耐心、诚恳地对他进行教育，并且吸收他加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sup>①</sup>，希望他能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然而，魏特林却自命不凡地以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自居，“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自以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他不仅仍然用他那一套基督教的教条、改良主义的试验和宗派密谋的策略，来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相对抗，甚至以恶毒的攻击、无耻的诽谤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善意的批评与帮助。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魏特林这个在工人运动中名噪一时的“大人物”，

---

<sup>①</sup>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是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而成立的宣传组织，它的主要成员除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斐迪南·沃尔弗等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会议上，魏特林无理坚持要首先立即出版他的彻头彻尾宣扬错误理论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迁就他的要求就会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他们同魏特林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会上有力地揭露、批判了他那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指出，必须同这种“手工业共产主义”作斗争，必须抛弃感伤的、宗教性的说教式的宣传，而代之以科学的、革命的宣传。他们证明，魏特林鼓吹的立刻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任务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他们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方针决不是魏特林的宗派密谋活动，而只能是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的政治斗争；如果没有事先制定好的科学纲领就去发动劳动者进行暴动，实际上就是欺骗他们，使他们产生一些无法实现的希望；这种没有准备的冒险行动是有害的，它将导致整个运动的毁灭。

此后，魏特林不仅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且加紧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勾结，疯狂地污蔑马克思、恩格斯，攻击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完全走上

了背叛革命的道路。1846年5月11日，当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会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有害活动时，魏特林竟公然为之辩护，并拒绝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上签名。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和他彻底决裂，并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同魏特林派划清界限，展开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他在当时各个主要的工人组织中的影响逐渐消失。

### 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战胜了魏特林主义之后，就集中力量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哲学家拚命鼓吹的反动思想。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小生产者的破产和贫困，使他们悲观绝望、胆战心惊，因此，他们把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法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和词句，硬搬到贵族地主统治的德国，并用以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又害怕阶级斗争，害怕革命，因而竭力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所谓“粗暴”和“片面性”，大肆宣扬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和人道主义，企图用超阶级的和平、博爱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

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同“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满足于谈论所谓“人性”、财产,为无产阶级感伤式地悲叹几声,组织几个可怜的慈善团体;他们由于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一无所知,由于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因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9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分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作品,揭露了他们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革命斗争、为专制制度效劳的反动本质,同时对它的哲学基础——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了深刻的批判。

当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侨居美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以德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自居,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上,大量散布那一套空洞的陈词滥调,败坏共产主义的声誉,引诱当地的德国侨民脱离革命运动。1846年5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对克利盖的有害活动进行了愤怒的声讨,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

《通告》揭露克利盖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共产主义学说,变成了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胡言乱语,



变成了玩弄华美词藻的无聊把戏，并且“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97页）而这种“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同上，第86页）从而模糊自己的阶级意识，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马克思、恩格斯还辛辣地嘲笑了克利盖把美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改革运动描绘为社会主义的全人类的事业、一切运动的最终最高目的的谬论。他们指出，克利盖妄图通过向统治阶级谄媚乞求，使一切人都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一举消灭贫困，建立起理想的“天国”的计划，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梦想，“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上，第94页）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在一系列著作和书信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断给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特别着重揭示，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无产阶级和一切民主力量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愈来愈显露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危险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反动的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出发，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阻

挠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诅咒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因此，它就成了德国封建专制政府“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和“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起着既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又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真正的社会主义”既然保护封建专制制度免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攻击，它也就必然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因为只有首先推翻地主贵族的封建统治，才能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所以，恩格斯极其愤慨地痛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页）

### 恩格斯在巴黎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计划的重点，是积极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来改造以德国工人为主体的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sup>①</sup>。但是，他们对克利盖的批判还远没有能使得正义者同盟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特别是同盟在巴黎的各个组织仍然处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

格律恩的严重影响之下。“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7页）竭力鼓吹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混合物，在巴黎的同盟成员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1846年8月，恩格斯受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开展工作。

恩格斯到达巴黎以后，立即同那里的正义者同盟各支部建立了联系，在其中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把最先进的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随即开始对格律恩及其信徒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格律恩之流正在拚命推销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货色，他们要工人们把自己的小额储蓄集中起来用作资本，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作坊，并让他们放弃利润和利息，使资本不断增加积累，以便再开办新的作坊和工厂。他们认为，如此继续下去，就能消除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使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就能把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收买过来，从而废除资本。恩格斯指出，无

---

① 正义者同盟：1834年，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巴黎成立“流亡者联盟”。1836年，从“联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分子的成员，他们组成了“正义者同盟”，后来又有其它国家的成员加入。这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秘密组织，它在思想上受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产者甚至连维持家庭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平都极感困难，那里有钱拿去储蓄呢？又怎么能用这种办法来购买整个法国呢？对于这种蒲鲁东主义的幻想，他尖刻地讽刺说：“既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卓绝的计划，并且打算变同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的硬币来，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页，1962年版，下同）因而它完全是一种“天大的荒唐事”，“荒谬绝伦的废话”。（同上，第12、13页）

格律恩之流在宣扬蒲鲁东主义的同时，还继续贩卖“真正的社会主义”，他用小资产阶级的华美的词藻、荒唐的梦呓把工人们的脑子弄得昏昏沉沉、糊里糊涂。恩格斯认为，必须着重揭露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反动本质。为此，他同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的格律恩的信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一次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会议上，恩格斯首先迫使格律恩的信徒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然后紧紧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进行原则性的斗争。这时，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的格律恩分子要求恩格斯给共产主义下一个定义。于是，恩格斯精辟地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是：“（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

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这样,恩格斯就从根本上驳倒了格律恩之流的谬论,既同主张阶级调和、普遍博爱、反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妄图保留私有财产、宣扬社会改良的蒲鲁东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使十五个参加会议的人中有十三个人拥护他的观点。恩格斯同格律恩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不久就同格律恩之流断绝了关系,并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 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经济理论

当恩格斯在巴黎同格律恩作斗争的时候,马克思也开始全力批判蒲鲁东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程度日益加深,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成批破产,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阶级斗争不断趋向激化。由于各个阶级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它们的思想和愿望也完全不一样。同无产阶级要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相反,那些已经破产和将要破产的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千方百计地梦想恢复和维持自己小私有

者的经济地位；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希望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消除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他们的这些思想和愿望的反映，而蒲鲁东就是它的典型代表之一。因此，在小生产者占优势的法国，以及其他经济比较落后的欧洲国家中，蒲鲁东主义有较大的影响。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出身于法国一个小私有者的家庭，父亲是农民兼木桶匠。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家庭破了产，丧失了土地。这样，蒲鲁东十二岁时就在一家旅馆当雇工。不久，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进中学读了几年书，然而尚未毕业就又被迫到一家印刷所当了排字工人。后来，蒲鲁东曾与人合伙开设过一个小印刷所，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而倒闭。因此，他对于小私有者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而业余自学时所读的大量书籍又使他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很深的影 响。1840年，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由于标榜社会主义，并大胆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财产就是盗窃”，他从此在社会上赢得了一些声望。马克思曾说这本书无疑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同时指出它并未从社会经济方面揭露

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而只不过是从小道德、法权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表示一种愤慨和谴责；也就是说，蒲鲁东仅仅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曾邀请他加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能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帮助他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但是，蒲鲁东不仅拒绝合作，反而恶毒地攻击、咒骂马克思主义，坚持他那改良主义的空想计划，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846年秋，他又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系统地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得不起来同蒲鲁东这个在工人群众中名声很大、信徒众多的人物，作公开的、坚决的斗争。

1847年4月，马克思写成《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一重要著作，着重从经济理论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作了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他指出，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把社会的历史看成是抽象观念的历史，并企图用他头脑中的运动来代替现实的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这一切表明，他从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只是接受了一些错误的、反动的东西。他根据庸俗的辩证法，把一切经济范畴都机械地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而他自己则可以发明出种种社会改良的方案，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方面。蒲鲁东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小所有者既要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又要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完全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可能实现的反动空想。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31页）同时，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证明人民群众一切苦难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无产阶级的贫困



和小生产者的破产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驳倒了蒲鲁东妄图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而用组织生产、销售、信贷合作社等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有力地批判了蒲鲁东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建立工人同盟、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谬论。蒲鲁东认为，普遍提高工资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从而导致贫困的加剧，因而成立工人同盟、开展罢工斗争都是有害的。他甚至叫嚷，“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马克思驳斥说，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下降，“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马克思嘲笑蒲鲁东的那种荒唐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同上）并揭露他和资本家的工头们是同声相应的。接着，马克思又针对蒲鲁东的反动观点，说明了工人同盟的作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以及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

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因为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已经变成整个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只有通过这种强大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真正的解放。

## 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

封建社会主义反映反动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英国，有以迪斯累里、卡莱尔为代表的“青年英国”<sup>①</sup>集团；在法国，有以维尔纽夫—巴热尔蒙<sup>②</sup>为

<sup>①</sup> “青年英国”是成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反动政客和文人的团体，它属于代表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托利党。迪斯累里（1804—1881），1868年和1874—1880年曾任英国首相。卡莱尔（1795—1881），作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1848年后成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sup>②</sup> 维尔纽夫—巴热尔蒙（1784—1850），曾任法国北方郡的地方长官。

首的一部分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统派。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的贵族地主阶级，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复辟旧的封建制度。他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时候，为了诱骗无产阶级群众跟着自己走，往往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竭力装出一副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者的样子。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而“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因而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与资产阶级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暴力镇压。

在德国，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当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运动急剧高涨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也竖起“社会主义”的招牌，宣扬基督教的“原则”，力图引诱无产阶级同他们一起去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以巩固现存的反动统治。为了帮助工人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批判。

当时，普鲁士反动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提出的征收所得税的提案被议会中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否决了。德国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尔曼·瓦盖纳利

用这件事在科伦的《莱茵观察家》报上大肆煽动，说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只是把人民当作攻击政府的炮灰，以便自己夺取政权；他甚至无耻地鼓吹无产阶级和国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发表了《〈莱茵观察家〉和共产主义》一文，揭穿了他的罪恶阴谋。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政府都不抱任何幻想，它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只有首先打倒封建专制统治，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崭新的武器和有利的地位。

为了替反动政府效劳，瓦盖纳竭力要无产阶级相信，依靠政府所得税的收入和基督教“仁爱”、“团结”的原则就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消除一切人的贫困和饥饿。马克思在批驳这种谎言时辛辣地嘲笑道，所得税的收入除去日常和非常的国家开支剩下的余额等于零，基督教的原则即天上的地产（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收入也等于零，瓦盖纳就是妄图把这两个零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马克思着重揭露了所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的反动性，他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

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它宣扬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它把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一切卑鄙齷齪的行为都说成是人们应得的惩罚；它把人民的幸福搬到天上，从而使地上的罪恶永世长存。无产阶级只有抛弃这种狡猾的、假仁假义的基督教原则，勇敢地起来革命，才能求得彻底的解放。

\*     \*     \*

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种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很快就同魏特林派断绝了关系，开始起来同“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明显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正是在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资本主义统治的层层乌云正笼罩着整个世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为数极少，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为同盟制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坚定不移地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

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并且庄严豪迈地宣布：“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同上,第285—286页)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 三、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

当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的时候，欧洲各国正面临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1848年2月下旬，巴黎工人首先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烈火；接着，德国、匈牙利、捷克、意大利等国也相继爆发革命。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猛烈进攻的同时，不仅和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了尖锐的斗争，而且无情地批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机会主义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

轰轰烈烈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实践是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好的检验。“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特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可恶的流派更被大革命的风暴一扫而光。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胜利地经受了考验，充分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被证明为无产阶级

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武器；而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伟大学说。

### 批判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

德国革命一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就根据对德国和整个欧洲政治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小邦分裂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同时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欧洲反革命势力的支柱沙皇俄国。回到德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他们认为，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无产阶级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思想上又深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应作为民主运动的左翼，即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一翼，参加斗争，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同时保持自己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参加了科伦工人联合会，而且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号召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加入工人团体的同时，也加入民主团体，在其中发挥领导



作用，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作斗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路线。

但是，以同盟盟员、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哥特沙克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却起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条策略路线。哥特沙克无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在他看来，广大工人群众对于德国是地主贵族的君主制还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是漠不关心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一种国家形式下都同样可以实现。因此他拚命反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行动，完全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狂妄地反诬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路线是什么“机会主义”，并且在由他控制的科伦工人联合会中通过了一项要工人们拒绝参加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的决定，不顾客观历史条件地提出了建立“工人共和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冒险主义口号。同时，在斗争方法上，哥特沙克又反对暴力革命，指责工人的所谓“过火行为”，主张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哥特沙克的这条错误路线必然将无产阶级置于孤立的、无所作为的困境，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自己的革命

路线，他们通过《新莱茵报》号召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完成自己在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为将要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坚决驳斥了哥特沙克的谬论。马克思指出，革命无产阶级决不能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也就是说，只有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共和国才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求得彻底解放；取消了无产阶级反对贵族地主统治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取消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先决条件。恩格斯也曾指出，如果当时不执行同民主派联合、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策略路线，“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他还尖锐地揭露哥特沙克是“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的“煽动

家”，是“以先知者自居”而又“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同时，恩格斯尖刻地嘲笑了哥特沙克的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他说，这是一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根据那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92页）

1848年5月1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召开会议，马克思以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哥特沙克，他明确指出，科伦工人联合会通过的不参加国民议会选举的决议是违反同盟中央的策略原则的。但是，哥特沙克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攻击同盟的章程威胁着他个人的自由，并宣布退出同盟。此后，他进一步以科伦工人联合会为中心，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对抗，加紧进行宗派分裂活动。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到6月底，科伦工人联合会开始摆脱哥特沙克集团的控制，并在7月初推选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莫尔担任领导工作。10月，马克思亲自兼任联合会主席。这年冬天，马克思、恩格斯终于把死抱住错误路线不放的哥特沙克分子从同盟中清除了出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科伦工人联合会修订了会章和宣言，贯彻执行了正确的策略路线，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对农民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批判波尔恩的右倾机会主义

当时,从右的方面跳出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的是同盟盟员、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斯蒂凡·波尔恩。

波尔恩抹杀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和领导作用,不懂得无产阶级应该努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拒绝参加为解决德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他反对工人们的任何积极的革命行动,甚至公开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尽一切力量使无产阶级不起“骚动”,因而当柏林工人夺取了军械库时,他却迫使他们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武器。他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以为法兰克福议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竭力宣扬改良主义的单纯经济斗争,把争得眼前利益的细微改善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目标。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恩格斯在批判波尔恩时说:“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

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因此，他所领导的工人兄弟会“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波尔恩迷信议会斗争、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他们说明，由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随时准备妥协投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法兰克福议会，是“老太婆议会”，是“清谈馆”，解决不了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只有拿起武器，“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页）“实行革命的恐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8页）才能有效地打击反革命，达到摧毁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用议会方式“争得那只有用革命方式即用武力才能争得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4页）因为拒绝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抗只是一种消极反抗，而“这种反抗就象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同上，第38页）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理论上，波尔恩竭力宣扬，工人阶级的不幸仅仅在于他们不能利用信贷，而组织在生产合作社中的工人就有可能对此加以利用，当一切工人都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无法存在；因此，工人在政

府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是建成所谓“公道的”社会制度的最好的方式。对此，恩格斯批判道，“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而这种货色只能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波尔恩还是一个野心家。他无耻地自夸不愿作“党的政策的奴隶”，他参加工人运动的目的是要“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同上）为此，他追求无原则的联合，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以便充当他们的首领。于是，聚集在他的团体里的往往是一些最落后的手工业者、半无产者、甚至有各色各样的坏分子；而他也就迎合他们的传统偏见，和他们“称兄道弟”起来。这种完全错误的组织路线曾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因为这样的组织必然担负不起革命的任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他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同上）结果，波尔恩本人也没有能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堕落为瑞士的一个小小的资产阶级教授。

## 批判路易·勃朗的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路易·勃朗(1811—1882)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组织劳动”、建立“社会工场”、实行“劳资合作”等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改善工人的处境。二月革命胜利后,工人群众把他当作自己的代表送进了临时政府。但是,他根本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却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法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时,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本质。

由于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法国工人还不可能提出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因此他们在革命中把路易·勃朗的“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等口号作为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马克思在批判路易·勃朗时指出,这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口号实质上是企图诱惑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己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这些要求是完全不

可能实现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所谓“组织劳动”，只能是雇佣劳动；所谓劳动部，无非是资产阶级的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设立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软弱无能的部。事实正是如此。在这次革命的初期，由于武装工人的强大力量的威胁，统治地位尚未巩固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勉强成立了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同时却乘机把他们逐出了临时政府所在地，从而把一切大权都保持在自己手中。而路易·勃朗居然以此为满足。对此，马克思辛辣地嘲笑说，卢森堡委员会<sup>①</sup>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但是，它既无任何经费预算，又无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同上）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利用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理论，假借满足工人对“劳动权”的要求，建立了按军事组织编制的、收容十万失业工人的“国家工厂”，以极微薄的工资驱使他们去做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

---

<sup>①</sup> 卢森堡委员会，即研究工人问题的专门常设委员会，因为会址在卢森堡宫，所以也称为卢森堡委员会。



这样，资产阶级既可以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0页）又得以借口养活“国家工厂”工人，向农民加征附加税，挑起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愤恨，从而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拉到自己一边，孤立了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当资产阶级感到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就立即回过头来对付无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把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赶出政府、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国家工厂、取消卢森堡委员会、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剥夺了工人在二月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成果。资产阶级迫使巴黎工人举行1848年的六月起义，并把奋起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巴黎工人投入了血泊。这就宣告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破产。马克思指出，巴黎工人的鲜血证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同上，第417页）他痛斥路易·勃朗之流是“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允许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同上，第300页）他号召无产阶级用“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同上，第417页）的革命战斗口号，来代替巴黎工人在二

月革命中由于受路易·勃朗的思想影响而提出的那些空想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批判了路易·勃朗之流的革命停顿论和超阶级的、空想的改良主义观点。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只满足于用信贷机关来驱除高利贷的迫害，用国家维持的合作社来消灭大资本竞争的威胁，用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等办法来抑止资本的增长；他们“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同上）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要消灭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夺得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这就从根本

2012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22.11.13

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一切冒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

马克思还猛烈抨击了路易·勃朗之流跟在资产阶级后面高谈的关于博爱的鬼话。他指出，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必然要发生激烈的冲突，所谓博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法国资产阶级对六月起义中的巴黎工人的血腥屠杀说明，“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同上，第300页）因此，马克思怒不可遏地把不断重复博爱词句的路易·勃朗之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痛骂为“犯了时代错误”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同上，第302页）人们有充分的权利去嘲笑他们。

### 批判维利希—沙佩尔 集团的冒险主义

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又同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冒险主义集团作了坚决

的斗争。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希望革命高潮能迅速到来;但是到1850年春夏,他们在深入研究了英、美、法、德等国近十年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后得出结论,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普遍繁荣阶段,不可能很快爆发真正的革命。在这革命的低潮时期,无产阶级应当改变自己的革命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规定了这样的任务:积极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和组织群众,为未来的革命斗争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努力建立和巩固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

但是,当时在伦敦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却不顾一切主客观条件,喋喋不休地发出种种号召暴动的喧嚷,妄图人为地“制造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同盟内部,就产生了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他们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制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硬是要求同盟和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采取统一行动,主张号召工人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他们还利用自己在同盟伦敦区部和其它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公开进行种种宗派分裂活动。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同

维利希、沙佩尔等人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同时，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恳切地教育这些人，希望他们纠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以维护同盟的团结和统一。然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不但拒不认错，反而标榜自己是不怕牺牲的“革命者”，恶毒地污蔑马克思、恩格斯是“专靠笔杆活动的人”。

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在会上严厉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指出：“少数派<sup>①</sup>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他又指出，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同时也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德国无产阶级还必须再经历长期的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锻炼；而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却说什么“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德国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而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却卑劣地迎合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

---

<sup>①</sup> 少数派，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他们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占少数。

者，因而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代表无产者。马克思斥责他们道：“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同上）马克思认为，如果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给同盟所带来的危害，同时也再次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马克思建议把同盟中央迁往科伦，在伦敦组织两个彼此独立的区部并属同盟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路线得到了与会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和拥护，会议通过了上述提案。

然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却拒绝服从同盟中央的决议，维利希等人当即挑衅性地退出会场；沙佩尔则公开说，在伦敦设立两个区部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此后，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大搞分裂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于11月11日向科伦同盟中央委员会提议，把这个宗派集团的头目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开除出去，并通报全盟。

为了论证和宣传无产阶级的策略路线，帮助同盟成员和广大工人群众从思想上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明政治革命和经济形势的关

系。他们指出，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互相矛盾的时候才能发生；在目前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繁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相对巩固的情况下，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必然会被碰得粉碎。同时，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精神科学地预言，“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8页）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被开除以后，继续打着同盟的旗号，向人民发出无穷无尽的“行动起来”的号召；而他们自己的所谓行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不过是“下流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无结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6页）罢了。他们不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盲目地热衷于种种关于“革命”的叫嚣，给资产阶级报纸提供了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材料，并使反动政府的警察、暗探得以钻入他们的集团内部，从而使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被发现，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因此，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不仅严重地阻碍和危害无产阶级的革命运

动，而且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动派镇压革命者的帮凶。马克思在谈到科伦同盟中央被破坏时曾指出，这“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8页）对于这种“哀叫”，他无比愤慨、无比轻蔑地斥责道：“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同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强有力的批判打击下，这个以吹牛为目标的宗派小集团不久就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中丧失了一切影响，无声无息地消失了<sup>①</sup>。

---

<sup>①</sup> 沙佩尔后来承认错误，又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身边。



#### 四、反对拉萨尔主义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德国布勒斯劳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家庭。这种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投机取巧、虚伪狡诈的恶性，无时无刻不想出人头地；然而，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象他这种出身的人的歧视，又使他向上爬的私欲总是得不到满足。1846年，拉萨尔包揽了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为被丈夫遗弃的伯爵夫人要求分享财产大卖力气，并无耻地把这种贵族家庭内部的争执描绘为“无产者”反抗权贵压迫的斗争，企图以此为自已获取社会上的名声和地位。1848年，他怀着捞取政治资本和发泄个人愤懑的打算投机革命，这时他认识了马克思。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他竭力装出一副真正要为革命而奋斗的样子；而他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却充分暴露了他充当资产阶级附庸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的真面目。由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拉萨尔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出狱后，他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凭着为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打官司赢得的大笔金钱终日过着

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而在工人群众面前，他却以“革命功臣”自居，傲慢地指手划脚。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这种无耻行径曾不断予以批评、警告。但是，他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一面声称自己拥护马克思，妄图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在工人群众中招摇撞骗，一面施展种种卑鄙伎俩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德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之后，拉萨尔便站到反动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投机工人运动，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经济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相应地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权力，但是它又十分软弱、动摇，妥协成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容克贵族为了对付资产阶级，在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竭力采取各种欺骗手段，以求把工人群众诱骗到自己一边。拉萨尔主义就是德国反动统治阶级这种蛊惑性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也是向容克贵族妥协、投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长期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在重新高涨的时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虽然迫切需要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斗争，但是由于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和严密封锁，他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却了解

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严重地阻碍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对于使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危害作用。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统一德国的道路和工人运动的纲领、路线与策略等重大问题上，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激烈的、长时期的斗争。

### 关于农民战争的论争

1859年初，拉萨尔出版了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于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斗争。在形式上，斗争是围绕着关于这个剧本的评价和农民战争的性质展开的，而实际上，它涉及到关于统一德意志的道路等重大的根本问题。

1525年，德意志曾爆发过其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此前不久，1522年，没落的骑士阶级（低级贵族）在济金根的带领下也进行过暴动。这两次战争不仅规模大小不可比拟，而且性质上也迥然不同。恩格斯在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曾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满腔激情热烈歌颂了1525年起义领袖的英勇精神，说明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指出革命无

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同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正如市民阶级的叛卖行为导致了十六世纪德国革命的失败一样，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是促使十九世纪德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是，拉萨尔不但不去歌颂农民的革命斗争，反而攻击它“不是革命的”，“归根到底甚至是反动的”。他在剧本中竭力美化封建的骑士阶级，把它的首领济金根吹捧成“革命家”和创造历史的“英雄”。在他看来，济金根的失败只是在于他个人的“失策”，致使同德意志皇帝的联盟未能实现，因而是所谓个人的“悲剧”。

拉萨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极端反动的政治观点，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尖锐批判。马克思指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必须直接发动农民和城市平民才有可能，而这些阶级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这正是悲剧的原因所在。恩格斯也指出，“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而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却决定了这种联盟根本不可能形成。因此，“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

“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马克思、恩格斯还斥责拉萨尔把骑士反抗看得高于平民和农民的反抗，在剧本中只描写运动中的官方分子，忽视非官方的平民和农民及其理论上的代表，把当时已经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上。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对农民运动的完全错误的观点，使拉萨尔看不到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

拉萨尔请出十六世纪骑士首领济金根的亡灵，完全是为他的反动的政治观点服务的。马克思后来在痛斥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勾结时曾经指出，拉萨尔本人就是那个想强迫德意志皇帝“站在运动的首位”的济金根。他之所以拚命地攻击农民群众，硬是要把骑士暴动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未能与皇帝结成联盟，其目的就在于：为他所宣扬的同普鲁士封建专制势力建立联盟的反动政治路线作辩护，为他所鼓吹的由普鲁士王朝领导自上而下地统一德意志的反动政治主张作辩护。拉萨尔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向容克<sup>①</sup> 贵族妥协投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揭露

---

<sup>①</sup> 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称为容克，他们垄断了国家高级文武官职，是反动的普鲁士王朝和德意志帝国的主要支柱。

说：“在一八五九年时他完全隶属于普鲁士自由主义的资产者的党。”（《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66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下同）

### 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论争

几乎就在论争农民战争问题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意大利战争的问题上同拉萨尔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这次斗争的焦点是统一德国的道路问题，因而意义就更为重大。

五十年代末，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德国的统一问题重新被提上历史日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摧毁一切封建专制制度，自下而上地实现统一。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在统一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由奥地利王朝来领导统一整个德意志，另一派则支持普鲁士王朝排除奥地利来统一德意志其余各邦。而拉萨尔为维护普鲁士容克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竭力鼓吹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王朝兼并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统一。在德国统一完成之前，关于统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马克思、

恩格斯同拉萨尔及其一伙进行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

1859年，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法国的波拿巴王朝为了对外扩张领土以巩固它在国内的反动统治，为了扼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并阻止德国统一以称霸欧洲，无耻地打起“援助”意大利的幌子，于4月底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法意奥战争（也称意大利战争）爆发前夕，恩格斯写了《波河和莱茵河》一书，论述了德国无产阶级对战争应取的立场。他认为，法国和支持它的沙皇俄国是当时欧洲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波河流域发动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侵占莱茵河，进攻德国；如果普鲁士向法国宣战，就会导致德国人民推翻普鲁士专制王朝的革命斗争。从坚持以革命方式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正确路线出发，恩格斯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促使拿破仑第三在战争中失败，以打击法国和俄国的反动势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意大利人民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才能发展德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为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意志创造有利条件。恩格斯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同和支持。早在1859年2月4日，在谈到即将爆发的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时，马克思就向拉萨尔指出：“在最初，它将在法国保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的

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8页)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法国波拿巴王朝的立场。

但是,拉萨尔却疯狂地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正确思想。他一面阻挠恩格斯的著作的及时出版,一面抛出自己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来与之相对抗。在这本小册子中,拉萨尔从维护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出发,支持法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奥地利在战争中失败,以利于普鲁士通过反革命的王朝战争的道路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同时,他还向意大利人民大肆散布对于拿破仑第三的所谓“援助”的幻想,破坏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拉萨尔的叛卖立场。在拉萨尔的小册子出笼后,马克思立即指出,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同上,第413页)并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革命的尖锐性”。(同上)他表示,如果拉萨尔竟然敢于以党的名义讲话,就有必要公开驳斥他。1859年6月10日,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对拉萨尔指出,他的小册子所宣扬的东西“绝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的观点”。(同上,第590页)此后不久,他又就此问题斥责拉萨尔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党



里的人怎样能够辩证地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这种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在我看来，就应当对俄法同盟宣战。”（同上，第615页）并且严厉警告拉萨尔不得代表党讲话。1860年，恩格斯又发表了《萨伏依、尼斯和莱茵》<sup>①</sup>，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统一德国和意大利问题上的革命路线，实际上也就再一次批判了拉萨尔的反动观点。

### 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

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逐渐高涨，一些先进的工人开始冲破资产阶级的控制，要求成立独立的阶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觉得有利可图，遂决定投机工人运动。1862年春，他发表了题为《工人纲领》的小册子，一面歪曲地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词句来装饰门面，但却根本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字，不提《共产党宣言》；一面竭力贩卖机会主义的货色，宣扬工人只要争得普选权，并通过在普鲁士国家帮助下建立的生

---

<sup>①</sup> 萨伏依和尼斯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地方。战争爆发前，意大利的撒丁王国的统治阶级决定把这两个地方割让给法国，换取法国的军事“援助”，来驱逐奥地利势力，以便由它通过战争实现在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统一。

产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妄图把工人运动变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工具。

从拉萨尔一开始政治鼓动的时候起，马克思、恩格斯就对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谈到他的《工人纲领》时，马克思曾经轻蔑地说：“这东西不过是《宣言》<sup>①</sup>和我们时常讲的其他东西的拙劣的庸俗化”。（《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57页）1862年7月，拉萨尔到伦敦时，马克思当面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不过，当时马克思还力图帮助他改正错误，因而反复向他阐明《共产党宣言》中的策略，教育他在德国应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当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容克贵族与专制政府时，就鼓励资产阶级；同时应时刻不忘与它的动摇性、妥协性作斗争，即使它们背叛了，无产阶级也应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然而，拉萨尔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表面上声称拥护马克思主义，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实际上却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怀着刻骨的仇恨。

从伦敦回到德国之后，拉萨尔加紧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挖空心思要把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引上歧途。当时，莱比锡的先进工人正在筹备召开全德工人

<sup>①</sup> 指《共产党宣言》。

代表大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拉萨尔的假革命面目所迷惑，写信要求他出来支持自己的斗争。于是，1863年3月1日，拉萨尔抛出了《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硬是要工人阶级把争取所谓“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把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作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并借口所谓“铁的工资规律”<sup>①</sup>反对工人开展罢工运动和一切革命斗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就连拉萨尔本人也曾供认，他在《公开复信》中所提出的东西“没有一点不是极其保守的”，它“是一个保守透顶的、合法的而且和平的解放工人的方式”。同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拉萨尔卑劣地压制了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先进工人，窃取了独揽一切大权的主席职位，并把他的那一套黑货写进了联合会的章程。这样，在拉萨尔的独裁统治下，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成了一个严重阻碍工人运动按照马克思主义方向

---

<sup>①</sup> 拉萨尔认为，工资决定于工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如果工资高于这一水平，就会提高出生率，而人口增加又会使工资降低；如果工资低于这一水平，就会降低出生率，而人口减少又会使工资增加。他断言，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

顺利发展的宗派主义组织。

拉萨尔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行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义愤，他们为此立即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曾这样说明他与拉萨尔决裂的原因：“（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强烈反对拉萨尔把争取所谓直接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唯一目的的机会主义纲领。他们反复强调，在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纲领中必须提出包括普选权在内的一切民主要求，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就必须首先打倒容克贵族专政的君主制反动政府，彻底摧毁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为争取无产阶级真正

解放的伟大斗争创造必要的前提。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提反对封建专制政府,不提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及其他民主要求,只强调所谓直接的普选权,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欺骗。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情况下,“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3页)马克思也一针见血地揭露说,拉萨尔之所以宣扬工人必须争取直接普选权,是为了“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也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情批判。拉萨尔的《公开复信》一发表,马克思就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嘲笑他的空想计划“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同上,第348页)斥责他企图“象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地揭露了拉萨尔的这种主张的机会主义实质,说明它所反映的只是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而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拉萨尔硬要工人阶级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反动容克贵族统治的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上,这只能模糊工人群

众的阶级意识,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并为统治阶级破坏、分裂、扑灭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便利。马克思指出,即使普鲁士王国政府愿意对合作社提供帮助,其规模也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根本不可能丝毫改善工人的悲惨处境;“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0页)因此,马克思严肃地警告说,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资产阶级政党曾深信他所执行的“新”政策,会使政权落在自己手里,结果使自己出了丑;“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同上,第351页)他指出,拉萨尔的这种幻想一定会使人大失所望,“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同上)马克思还揭露了拉萨尔鼓吹的所谓“国家帮助”的货色,并不是他自己的创造,“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sup>①</sup>为

---

<sup>①</sup> 菲利浦·约瑟夫·毕舍(1796—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后来参加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页）而这种反动口号又使他“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同上）

### 揭露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勾结

从1861年开始，围绕着改组军队的问题，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斗争，这就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所谓“宪法纠纷”。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都力图把工人阶级拉拢到自己一边，以便打击自己的对手。1862年，普鲁士容克贵族最反动的政治代表俾斯麦（1815—1898）出任首相，他一面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强制实行军事改革，叫嚷要用“铁与血”发动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一面加紧对工人阶级进行欺骗、诱惑，妄图控制工人运动。

拉萨尔迎合容克贵族反动政策的需要，拚命在工人运动中推行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策略路线。他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进步党，煽动工人用全部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不许他们同当前的主要敌人封建专制政府作斗争；同时无耻地吹捧国王和俾斯麦，诱骗工人使之相信

他们会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为了给自己的反动的策略路线辩护，拉萨尔还故意淆乱阶级阵线，硬把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包括农民在内，都说成是“反动的一帮”。从1863年起，拉萨尔多次同俾斯麦进行秘密的通信和会谈。在与俾斯麦的勾搭中，他不仅卑躬屈膝地表示效忠于国王和反动政府，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统治”、“他们都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而且直接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俾斯麦建立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支持俾斯麦用反革命方式统一德意志，同意他兼并当时属于丹麦领土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并企图以之换取俾斯麦实施普选权。这说明拉萨尔是混入工人运动中的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工贼。

对于拉萨尔的这些阴谋活动，远在英国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完全了解<sup>①</sup>，但是凭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与德国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的密切联系，他们已经从拉萨尔的言论和行动中察觉到，他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卖身投靠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早在1863年6月11日，恩格斯就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拉萨尔“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当俾[斯麦]先生讨厌他的

<sup>①</sup> 拉萨尔和俾斯麦的秘密通信到1928年才被公布出来。



时候，有一天他会被投入狱中，并认识普鲁士的国法……他现在不仅站在《奥格斯[堡]》的保护之下，并且也站在《十字报》的保护之下”<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63—164页）不久之后，恩格斯又说明，拉萨尔对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已经被封建反动势力用来为专制政府的报纸条例辩护，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质上是为容克贵族的利益效劳的，并指出：“拉萨尔的政治运动已经根本毁灭了”。（同上，第179页）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拉萨尔拚命攻击资产阶级，并且按照俾斯麦的调子，辱骂普鲁士王朝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敌手奥地利人，对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俄国则一声不响，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处“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同上，第166页）马克思还尖锐地揭露，拉萨尔的言论“确实具有十分令人讨厌的保皇主义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页）

1865年初，当马克思、恩格斯从李卜克内西处得知拉萨尔曾与俾斯麦订立秘密协议，支持他的侵略政策时，他们立即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痛斥了拉萨尔的叛卖行径。马克思说，“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3页）他象自由派资产阶级一

---

<sup>①</sup> 《奥格斯堡》，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的反动日报《总汇报》，《十字报》，即《新普鲁士报》，是反动的君主派日报。

样，“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同上，第354页）恩格斯也斥责道：“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他同俾斯麦的勾搭完全“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

为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认清拉萨尔同俾斯麦勾结的丑恶嘴脸，马克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论蒲鲁东》一文，针对拉萨尔支持普鲁士王朝的叛卖活动，严厉谴责蒲鲁东向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献媚，指出“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都是不能容忍的。恩格斯也针对拉萨尔为掩饰自己同俾斯麦之流的封建贵族势力的勾结，而把农民污蔑为“反动的一帮”的谬论，在该报上发表了一首丹麦古代民歌，并加了评论。他向德国工人阶级说明，他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同时，必须反对容克贵族，并强调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对于以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者自居的拉萨尔之流只反对资产阶级，而对反动专制政府却默不作声的行为，恩格斯也作了坚决的

揭露。他指出：“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页）

### 积极支持先进工人 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十分重视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拉萨尔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变成了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宗派主义组织以后，他们就更深切地感到，必须帮助德国工人群众抛弃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使他们还不可能公开地、全面地批判拉萨尔主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首先从正面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自己的革命路线来教育和武装工人阶级。从1863年起，他们就在德国工人中大力传布《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为他们认清拉萨尔的理论 and 策略的机会主义本质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自觉地踢开拉萨尔主义这块绊脚石，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积极地支持和指导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和奥格斯

特·倍倍尔(1840—1913)等人在德国工人中所进行的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李卜克内西在1862年7月从英国回到德国之后，不久就有保留地加入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告诫他要注意同拉萨尔划清界限，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教育周围的工人群众。李卜克内西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积极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揭露、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行径，争取与团结其中的先进分子，很快形成了一个革命的左派力量。1865年后，在李卜克内西的帮助下，倍倍尔也在1863年成立的另一个工人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努力促进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864年8月拉萨尔死去之后，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施韦泽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他们为该报撰稿。为了直接向德国工人宣传第一国际的革命原则，促使他们摆脱拉萨尔主义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在施韦泽保证不在报上宣扬拉萨尔主义的条件下，同意为之写稿，并陆续在该报上发表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等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教育德国工人阶级认识拉萨尔之流的反

革命面目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施韦泽是个彻头彻尾的拉萨尔分子，他表面上答应马克思、恩格斯，不散布拉萨尔的黑货，实际上却全盘继承了拉萨尔的理论 and 策略，顽固地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竭力阻挠工人组织加入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他还在报上不断地颂扬拉萨尔，攻击第一国际，向普鲁士王朝暗送秋波，鼓吹工人阶级和俾斯麦结成联盟去反对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严厉的谴责和批驳。马克思强调指出：“无论如何，空气必须澄清，党必须洗清拉萨尔的这种遗臭。”（《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69页）在给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指出工人阶级应该坚持以革命斗争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解放；并警告施韦泽，“必须反对俾斯麦，就连工人党向俾斯麦献媚的影子也必须加以消除”。（同上，第167页）然而，施韦泽不但拒绝马克思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公开支持俾斯麦发动王朝兼并战争统一德国的反动政策。因此，在1865年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不得不决定同施韦泽之流彻底决裂。他指出：“既然总得和这个家伙决裂，那不如现在马上

就决裂。至于德国的庸人们，他们愿意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吧。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人迟早总会跑到我们这边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马克思的决定得到了恩格斯的全力支持，2月23日，他们发表声明，宣布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一切联系，并恰如其分地把拉萨尔主义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74页）

不久，恩格斯出版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各个阶级和政党在“宪法纠纷”中的立场，针对拉萨尔主义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和策略。恩格斯彻底揭露了俾斯麦政府维护容克贵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欺骗宣传，教育无产阶级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支持专制政府，号召他们“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7页）他还无情地批判了拉萨尔把争取直接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唯一目的的机会主义本质，驳斥了他对农民的污蔑，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不把农民群众团结争取到革命运动中来，“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同上，第83页）与拉萨尔站在专制政府的立场上攻击资产阶级针锋相对，恩格斯

要求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同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并对它在这种斗争中所表现的任何懦弱、动摇和妥协行为进行揭露；即使资产阶级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要把斗争继续下去。同时，他还指出，德国工人在反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时，一刻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德国的传播，有力地引导先进工人摒弃拉萨尔主义，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865年，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普鲁士，他到了莱比锡，从此同倍倍尔一起进行活动。倍倍尔在1867年当选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在他的影响下，该组织逐渐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1868年，该组织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宣布赞成第一国际的方针路线。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德国先进工人同拉萨尔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特别着重批判它支持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反动路线，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发动人民革命、摧毁专制制度以完成德国统一的正确路线。

这一切大大促进了拉萨尔派内部工人群众的觉醒。1868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在广大工人的压力下，通过了赞成罢工运动和与第一国际采取共

同行动的决议。虽然施韦泽为首的拉萨尔分子顽固地拒绝实施，但这两项决议本身就是对拉萨尔主义的沉重打击，拉萨尔派的影响大为削弱。因此，施韦泽被迫写信给马克思，企图要求他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的身分使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停止反对拉萨尔派的活动。马克思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在给施韦泽的复信中，他进一步批判了拉萨尔关于所谓普选权和“国家帮助”的机会主义教条，痛斥他向封建反动派投降、阻挠德国和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合等无耻行径，并指出，“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马克思还严厉斥责施韦泽本人“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同上，第371页）最后，马克思声明，在工人运动的利益需要的时候，他将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

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在爱森纳赫正式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这个党的活动，经常在同拉萨



尔派斗争的策略问题上给它的领导人以重要的指示。为了加强德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马克思还曾致力于使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分子控制下的工人组织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是由于施韦泽之流的阻挠和破坏而未能成功。此后，拉萨尔派便日益堕落，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他们奉行沙文主义路线，公然支持普鲁士王朝侵略法国的政策，反对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因此，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曾无比愤慨地指出：“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然而，拉萨尔主义的流毒仍然影响着德国的工人运动，到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它作了全面的、彻底的清算。

## 五、反对蒲鲁东主义

1864年，马克思在伦敦亲手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在第一国际中首先跳出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的是蒲鲁东主义者。

早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尖锐地批判过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成立时，它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仍有较大的影响。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散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组织和国家、要求个人绝对自由等谬论，鼓吹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交换银行”来实现“社会主义”，并企图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他们的活动严重危害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捍卫第一国际

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 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 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1863年，波兰人民举行了反对沙皇俄国的反动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这一正义斗争得到了欧洲各国工人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然而，蒲鲁东却在自己的著作里为沙皇俄国的民族压迫政策辩护，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马克思曾痛斥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在1865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讨论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时，马克思提议把工人阶级对波兰起义的态度问题列入其中，遭到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无关，无产阶级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只要关心“社会革命”就行了。马克思在同他们作斗争时说明了，以沙皇俄国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的同盟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主要障碍，只有扫除这个障碍，才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道路。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经过激烈的争论，会

议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支持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的决议，并将波兰问题列入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同时，代表会议还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不接受脑力劳动者加入第一国际的荒唐提案，粉碎了他们妄图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挤出去，以便于篡夺国际的领导权的阴谋。

蒲鲁东主义者对波兰起义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反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反动本质。当时，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不能直接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为了反击蒲鲁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在1866年春陆续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一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号召各国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反动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正义斗争。他证明，波兰独立的恢复必将沉重打击沙皇俄国的反动势力，促进整个欧洲的革命民主运动，并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援助波兰人民的革命。同时，他揭露俄国和法国的反动政府妄图利用民族问题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的险恶用心，有力地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革命立场同波拿巴主义的所谓“民族原

则”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他们无视民族问题、反对工人阶级对波兰独立运动的支持，实际上是在为沙皇俄国政府的反动的民族政策效劳。

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还在总委员会内宣扬，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他们主张各个地方的居民都组成自治的小团体，然后由这些小团体结合为“自由联邦”。马克思尖刻地嘲笑了这种无聊的空想，他说：“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马克思还揭露了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这种谬论的沙文主义本质，说明他们实际上是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这只能对反动政府的侵略政策有利。

### 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反对革命 斗争、鼓吹社会改良的谬论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反对一

切政治斗争,而且反对一切经济斗争,认为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所谓“交换银行”,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病、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蒲鲁东主义者始终坚持的教条。这种谬论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特别有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着重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幻想,说明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同时特别强调政治斗争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大意义。

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马克思针对蒲鲁东主义的反动观点,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合作社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他指出,合作运动作为反对资本的一种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页)由于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阻挠、镇压工人群众的解放事业,以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和对劳动者的奴役,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同上,第134页)为此,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组织自己的独立政党,为推翻

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阶级而斗争。

1865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论蒲鲁东》一文，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鼓吹建立“交换银行”，妄想通过发放无息贷款，使无产者得以购置生产工具进行独立生产，使小生产者能够免于因受高利贷盘剥而破产，并组织产品的直接交换来避开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4页）的企图。他指出，蒲鲁东“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十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同上，第146页）同时，马克思透彻地剖析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揭露他无论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在政治观点上，都“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同上，第147页）他又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和一时的风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向现存政权的妥协。

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力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组织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空想主张。马克思说：“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直接交换的印记，就象设

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4页注(24)）恩格斯也说：“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弃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他还指出，如果蒲鲁东主义者的这种反动主张真的实现了，那么人类就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从而陷于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而饥饿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领导多数代表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的谬论，使会议通过了号召无产阶级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决议。1866年9月，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为了保证总委员会的代表能在大会上击败蒲鲁东主义者，他起草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sup>①</sup>，为第一国际提出了同蒲鲁东

<sup>①</sup> 第一国际的领导机构总委员会在1866年年底之前称为临时中央委员会。



主义完全对立的具体的战斗纲领，要求它坚决地支持、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积极地引导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并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在这个文件中，马克思首先强调，把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行动联合起来，是国际的基本任务。同反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蒲鲁东主义者针锋相对，他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恢复体力、发展智力和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指示大会号召无产阶级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针对蒲鲁东主义者鼓吹合作运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谬论，他明确指出，合作运动本身根本不可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社会变革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为了清除蒲鲁东主义者反对组织工会的思想对工人阶级的不良影响，他阐述了工会的作用，说明工会不仅对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工人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中心；同时，他也指出了过去的工会组织仅限于经济斗争的缺点，要求它自觉地“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同上，第221页）这样，他就解决了经济斗争与

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整个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拟订的这一文件被作为总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日内瓦代表大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坚决驳斥了蒲鲁东分子反对革命的阶级斗争、鼓吹和平的社会改良的论调，否决了他们妄图把国际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合作社的建议，批准了马克思制订的《共同章程》。对于他们大肆喧嚷的合作社问题及其他许多问题，大会也按照马克思的意见，通过了正确的决议，这就给了蒲鲁东主义者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日内瓦大会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同蒲鲁东主义者作斗争。在批判法国的蒲鲁东分子的所作所为时，马克思说：“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而蒲鲁东

“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在1867年9月于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马克思的代表又在政治斗争问题上完全击败了蒲鲁东主义者。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赢得社会解放的首要的和绝对必不可少的措施。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首先争得政治权利，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然后才能够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实现彻底的解放。洛桑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斗争的决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 粉碎蒲鲁东主义者妄图永远 保存私有制的反动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者斗争的另一个焦点是所有制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主张把消灭一切私有制度，使全部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工人

运动的伟大目标。蒲鲁东主义者则代表着小私有者的利益，逆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一面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一面又力图永远保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及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顽固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讽刺的口吻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注（24））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小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一种形式；要想永远保留私有制，也就是企图永远保留资本主义。恩格斯也曾说过：“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这就是说，蒲鲁东主义者的理想只是建立一个以小私有者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的社会；因此，他们死抱住小商品生产和小土地私有制不放，妄想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他们头脑中空想的、实际上根

本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公平规定”来改造自己。

在洛桑代表大会上，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代表同蒲鲁东主义者就所有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法国的托仑为代表的一部分蒲鲁东分子拚命维护土地私有制，宣扬什么“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代表驳斥了他们的谬论，坚决要求实行土地全社会集体所有制。由于蒲鲁东主义者在代表中占多数，大会对此没有作出任何结论。

在1868年9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又挑起了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辩论。马克思为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早在洛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不久，他就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sup>①</sup>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7页）会议期间，马克思在得知大会进展情况之后，又从伦敦写信给参加会议的总委员会代表，

---

<sup>①</sup> 指《资本论》第一卷。

指示他们在同蒲鲁东主义者斗争时所应遵循的策略。这一切保证了大会的胜利。

布鲁塞尔大会坚决批判了那些认为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攻击公有制是“粗野的共产主义”的蒲鲁东主义者，驳倒了他们关于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的反动谬论，并且不顾他们的阻挠和抗议，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正确决议。决议认为，一切工业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事业以及森林、土地都应归全社会所有，并指出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决议致命地打击了蒲鲁东主义者，粉碎了他们妄图永远保存私有制的反动主张。它表明，在无产阶级斗争目标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布鲁塞尔大会以后，由于少数蒲鲁东主义者仍然顽固地为土地私有制辩护，因此马克思又在1869年7月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专门就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了两次发言，批判了所谓人对土地的天然权利的论调，强调指出实现土地公有制是一种社会必然性。在1869年9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除了四个蒲鲁东分子仍死抱住土地私有制的反动原则不放之外，绝大多数代表都主张土地公有，并就此再次通过决议，指出：“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社会所有。”这项决

议标志着，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对蒲鲁东主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还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后不久，蒲鲁东主义者内部就发生了分裂。以后来成为巴黎公社委员的瓦尔兰为代表的左翼逐渐抛弃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在工人运动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而右派蒲鲁东分子如托仑之流以后则堕落为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刽子手们的帮凶，最终被第一国际所开除。巴黎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这次革命的伟大实践宣告了蒲鲁东主义的彻底破产。从此，这个宗派的势力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也就大大削弱了。

### 反对蒲鲁东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企图

1872年，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米尔柏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用使每个工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主人的办法，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住宅缺乏问题。这种公然宣传早已破产了的蒲鲁东主义的现象，激起了恩格斯的极大愤慨。他立即写了总题为《论住宅问题》的一系列战斗性论文，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

则。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彻底批判了米尔柏格之流的蒲鲁东主义者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的空想计划，揭露了他们妄图把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使现代无产者变为拥有小住宅、小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反动立场。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阶段上，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小块土地，曾经是工人有较好的生活的基础。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统治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对工厂工人来说，迁移自由是必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资本家压低工资的力量。同时，小房屋、小菜园、小块土地易于使人们养成无声无息、安于现状的奴隶精神。因此，它们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恩格斯指出：“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7页）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缓慢地饿死然而肯定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交换地位了。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



来的枷锁的无产者，从而创造了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条件。“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7页）因此，恩格斯认为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之流的谬论“只能是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出的悲歌”。（同上，第541页）

同时，恩格斯无情地嘲笑了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改良计划的空想性。他说明，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把现代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同上，第483页）

恩格斯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住宅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就是必须把它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因为住宅缺乏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它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趋严重；所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住宅问题以及任何与工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掌握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之后，

住宅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在为同米尔柏格的论战作总结的时候，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一切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的所谓“实践”。他说：“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0页）

恩格斯对米尔柏格的斗争致命地打击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传播蒲鲁东主义的企图，使德国无产阶级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 六、反对英国工联主义

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同第一国际中的英国工联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工联主义是英国宪章运动衰落以后发展起来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由于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有了急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占有广大的殖民地领土和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剥削许许多多的国家，掠夺越来越多的财富。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金钱来收买和培植少数工人贵族，使他们处于享有特权的经济地位，并利用他们来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分裂、削弱以至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工联主义就是英国资产阶级这种反动政策的产物，它反映了由少数领取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人贵族阶层的思想和利益。工联主义者反对革命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诱骗工人脱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而把争取生活条件的细微改善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实际上起着维护资产阶

级统治的作用。

### 批判工联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 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

英国工联主义者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他们代表着少数上层工人的狭隘利益，把绝大多数普通工人群众排斥于工联组织之外；他们宣扬“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机会主义口号，竭力把工联组织的斗争仅仅局限于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的狭小范围之内；在斗争方式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群众的战斗性的罢工，而妄图依靠同资本家的“谈判”，即用哀求、乞讨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工联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谬论，及其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中的叛卖行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愤怒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

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就曾尖锐谴责英国的一些工联主义者由于“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他针锋相对地说明，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是夺取政权，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1865年，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从根本上批判了工联主义者的错误。在充分肯定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夸大这种斗争的作用，因为“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同上，第203页）所以工人阶级不应当只局限于这种斗争，“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上，第203—204页）马克思还严厉地指出，英国工人群众的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领导他们的工联主义者“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上，第204页）

1866年，在为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工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

日常斗争，特别是对于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必要性及其伟大作用，有力地批判了反对组织工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同时，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过去的工会组织的缺点就在于，它们仅限于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伟大力量，因而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马克思说明，工会组织绝不应该只是为某些上层工人获取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应该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它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因此，它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并且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实际上都是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工联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出卖工人阶级斗争的可耻行为，马克思还经常指出，即使是在为暂时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日常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也必须依靠自己坚强的革命斗争和战斗性的罢工，而丝毫也不能指望同资本家的所谓“谈判”，因为“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

即使在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220页）

恩格斯也曾不断地揭露工联主义者把谋取少数工人贵族的狭隘的经济利益当做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斥责他们一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他指出，工联主义者控制下的“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8页）这种所谓罢工由于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把工人运动推进一步。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年代里，这种罢工常常是资本家故意制造出来，以便找到一个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因此，它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只有害处。为了清除工联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恶劣影响，恩格斯不倦地教导英国工人群众，应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在批判工联主义者迷恋于单纯的经济斗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的时候，马克思也注意反对了忽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日常斗争的必要性的错

误倾向。1865年5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英国人约翰·韦斯顿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反对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他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使资本家抬高商品的价格，因而归根结底对工人没有任何好处，并由此得出了工会“有害”的荒谬结论。前面提到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就是马克思于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专门为批驳韦斯顿而作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马克思通俗地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鲜明地指出韦斯顿的谬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9页）

马克思详尽而有说服力地驳斥了韦斯顿关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商品价格相应提高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工资的提高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由于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因而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暂时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商品的资本家也就靠提高商品的市场价格来补偿他们因支付工人工资的增加所受的损失。但是，对必需品以外的商品的需求不会随着工资的普遍提高而提高，生产这些商品的资本家也就无法用提高产品价格的办



0 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相反，这些资本家会因支付工资的增加、必需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收入，为此他们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从而引起对于这些商品需求额的缩减及其价格的降低。这样，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下降。而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别，又必然会使资本和劳动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直到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重新趋于平衡。“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同上，第155页)马克思还指出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期间确实有过工资提高的情形，他用英国在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在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之后，工厂产品价格不断降低、劳动生产力惊人发展、销售市场空前扩大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韦斯顿的观点的荒谬性。

针对韦斯顿反对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荒谬思想，马克思论证了这种斗争的必要性。他科学地考察了工业发展进程中机器的广泛采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随着积累的进展而发生的资本构成中不变资本所占比例的增大等情况，说明现代工业发展的本身

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使平均工资水平降低，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同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工人为提高工资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力求维持劳动力的现有价值。马克思指出，工人为工资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时候，既强调了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斗争的伟大目标的重要性，又充分肯定了工人群众为暂时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进行日常斗争的必要性，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为工会运动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在选举改革问题上的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人民掀起了争取第二次

选举改革<sup>①</sup>的民主运动。为了动员英国工人群众踊跃参加政治斗争，从而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号召第一国际对这一运动予以积极的支持。在1865年1月3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组成争取选举改革的同盟，这些条件是：必须在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普选权的要求；必须有第一国际的代表参加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机构，以便对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监督。他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激进派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必定会在运动中策划叛变的阴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实行不依赖于他们的独立的政策，并在他们妄图背叛的时候，坚决地加以揭露。这就为第一国际和英国工人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2月23日，根据总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它的直接参加下，全国性的选举改革同盟成立，它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但是，受总委员会委托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克里默等人不但完全拒绝贯彻马克思所制定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纲领和策略，根

---

① 第一次选举改革运动发生于1832年。在这次改革中，工业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迫使封建地主贵族阶级让步，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但是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因受财产资格限制，仍未取得选举权。

本不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真正的斗争，反而向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竭力把选举改革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议会斗争的狭小范围之内。早在1865年3月，克里默等就公开反对工人为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而采取独立的行动。1866年3月，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改革选举制度的法案。奥哲尔、克里默等工联领袖就完全背弃了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要求，公然尾随资产阶级激进派，对政府的这一法案表示支持，吹捧它是什么“足以获得人民衷心 and 认真支持的有利的改革步骤”，并妄图组织群众开展拥护法案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立即领导第一国际和英国先进工人揭露了这个法案的不彻底性和欺骗性。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法案时说，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局部让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04页）他把它称为“可怜的改革法案”，是“在这里所能搞得出来的最保守的东西”。（同上，第213页）马克思、恩格斯还愤怒地批判了工联领袖们的妥协、背叛行径。马克思指出：“一切英国运动的可诅咒的传统性又在选举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了。”他斥责工联领袖们“这些家伙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竟然把政府的“局部让步”“看成是体面的斗争成果”。（同上，第199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工联主义者领导的“选举改革运动是普遍萎靡不振的普遍供认”。（同上，第204页）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同时也由于上述改革法案被议会否决导致自由党内阁下台,更反动的保守党政府上台,群众运动又开始高涨,并重新提出了要求普选权的口号。在第一国际的领导下,6月27日,伦敦工人群众召开了大规模的示威大会;而在7月23日至25日连续三天的示威活动中,愤怒的群众已经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从而使运动逐渐显示出革命的性质。就在这种关键时刻,改革同盟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联主义者,由于极端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可耻地与政府谈判、妥协,硬是把蓬勃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了下去。在7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时,马克思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痛斥他们是同反动政府的大臣“互相恭维”的“恶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6页)8月31日,马克思又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第一国际成员约·菲·贝克尔,揭露奥哲尔、克里默等改革同盟中的工联领袖已经彻底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说:“不论克里默或者奥哲尔,他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克里默先生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了。”(同上,第526页)他指示贝克尔不要选举奥哲尔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主席,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选举克里默担任国

际的总书记。

1867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改革法案，它除了使小资产阶级和少数生活优裕的工人获得选举权外，依然剥夺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和农民的政治权利；工联领袖的叛卖活动终于破坏了英国人民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因此，在9月2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强烈谴责了工联主义者，并使会议作出了撤销奥哲尔的总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奥哲尔之流的工联领袖一心想在工人运动中依靠资产阶级政党的帮助，为自己捞取名利和地位，所以马克思后来曾痛斥他们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是“工人中想参加下届议会的阴谋家”。（《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16页）

### 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斗争

六十年代，爱尔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芬尼亚运动<sup>①</sup>。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抱什么态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同英国工联领袖斗争的又一个中心问题。

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的地主贵族几乎霸占了爱

<sup>①</sup>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年被正式并入英国。芬尼亚是爱尔兰历史上一个英勇部落的名称，爱尔兰爱国者把自己的秘密革命组织称为芬尼亚社，芬尼亚社的宗旨是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

尔兰的所有土地，对爱尔兰人民的残酷剥削不仅是他们赖以维持其在英国本土统治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统治阶级竭力人为地挑起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民族对立，使得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却没有力量；因此，只有使爱尔兰独立，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才能加速英国的革命。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马克思提出，第一国际必须“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同时它还必须“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1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但是，奥哲尔、鲁克拉夫特等工联领袖却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对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芬尼亚运动横加指责，他们实际上起着维护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压迫爱尔兰人民的作用。1867年10月30日，他们在改革同盟理事会会议上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污蔑芬尼亚运动，并且在11月1日投票赞成攻击爱尔兰人民斗争、污蔑芬尼亚社社员为“叛乱者”的决议。

对此，马克思十分气愤，在11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改革同盟中的‘我们的人’做出了怎样的丑事。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0—381页）在总委员会内，他力促第一国际声援爱尔兰人民的正义斗争。1867年11月12日，总委员会决定公开辩论芬尼亚运动的问题。在11月19日的辩论会上，马克思的拥护者列斯纳、杜邦等人发言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工联领袖对芬尼亚运动的攻击，说明爱尔兰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发动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国际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否则就是背叛自己的责任。总委员会内的工联主义者大都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有鲁克拉夫特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进行狡辩，继续指责芬尼亚运动的暴力形式，并企图“劝告”爱尔兰人民采取合法的、和平的策略。他的这些谬论遭到了与会者的驳斥。马克思带病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二天，他又在总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给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抗议书，强烈谴责法庭判处四名芬尼亚社社员的死刑。12月16日，马克思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作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痛斥了十六世纪以来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指出：“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



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附录〕第639页）他分析了芬尼亚运动的原因和特征，说明它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的要求，并批驳了资产阶级和工联主义者对它的污蔑。最后，他明确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应该把要求爱尔兰独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

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也热烈同情和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斗争。他经常积极帮助芬尼亚社社员躲避政府的追捕，热情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认真批评他们脱离群众的密谋策略。同时，为配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内同工联领袖作斗争，他还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研究了爱尔兰问题，并亲自去那里作过实地考察。在已写成的《爱尔兰史》<sup>①</sup>中，他揭露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压迫和剥削，批驳了为可耻的殖民统治辩护的各种反动论调，倾吐了对爱尔兰人民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1869年夏秋，爱尔兰人民大规模地开展了要求赦免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马克思立即予以积极的支持，并亲自参加了10月24日伦敦工人群众为此举行的示威游行。当时的自由党内阁一面加紧镇压措

---

<sup>①</sup> 由于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期间繁忙的革命工作，恩格斯的《爱尔兰史》未能完成，只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一部分及其他一些片断。

施，一面提出种种欺骗性的改革诺言，而工联主义者也就公开走上了向反动政府献媚的道路。为了揭露政府的反动的民族政策和工联领袖的背叛行为，11月9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书面提出了讨论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和英国工人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的建议。16日，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并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揭露了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人民许以改革诺言的欺骗伎俩，声讨了它残害被囚的爱尔兰人的血腥暴行，说明它的政策同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没有丝毫的差别；他还指出，格莱斯顿要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放弃信仰、背叛祖国、屈膝求饶作为释放的条件，是对爱尔兰人民的侮辱。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的这一行动，不仅是为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6页）而且是为了使英国工人阶级在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上同统治阶级和工联主义者划清界限，并使他们认识到，和爱尔兰人民一致行动，让爱尔兰民族独立，“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同上）马克思的发言和他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政府，也击中了工联主义者的要害，“使那些向格莱斯顿献媚的人吃了一

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244 页)在 11 月 23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主义分子莫特斯赫德公然反对马克思的决议草案,攻击爱尔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并无耻地颂扬格莱斯顿及其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奥哲尔则企图掩盖自己的背叛立场,因而只是借口激烈的语气会引起格莱斯顿的“不满”,并导致被囚者无法获释,竭力要求把决议草案中对自由党政府政策的估计改为温和的措词。马克思在总结发言中痛斥了莫特斯赫德的卑鄙行径,揭露了格莱斯顿的民族政策的反动性,强调在爱尔兰问题上必须公开反对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并针对奥哲尔的谬论指出:“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重要。”“通过决议并不是为了争取释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经不指望这一点了。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的措施作出评价;这一决议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附录〕第 669 页)同时,为了使奥哲尔的机会主义面目自行暴露,从而“迫使他陷入困境”,(《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244 页)马克思让他提出自己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交下次会议讨论。11 月 30 日,奥哲尔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不但丝毫不敢攻击自由党政府,反而卑劣地吹捧格莱斯顿说,“他比在他以前执政的一切

人都好”。这样，他就彻底暴露了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可耻面目。会议批判并否决了他的意见，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表达了第一国际对爱尔兰人民正义斗争的热烈支持。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曾被宣布为第一国际机关报的工联报纸《蜂房报》，在奥哲尔之流的操纵下，不仅拒绝刊登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的消息，而且学着资产阶级反动报刊的腔调，连篇累牍地发表污蔑和攻击芬尼亚运动的材料，竭力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在报道总委员会会议时，也经常删改决议的内容。因此，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关于同《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的建议，并委托他就此起草决议。马克思在决议中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蜂房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资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并利用它作为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0页）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以奥哲尔为代表的一部分工联领袖疯狂地污蔑这个伟大的革命创举，攻击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公社的正确立场，反对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宣言《法兰西内战》，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走上了彻底背叛革命的可耻道路。为此，国际总委员会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加下，在1871年6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签名；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批准了由恩格斯起草的一篇声明<sup>①</sup>，同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决裂，这次会议不仅谴责了他们的叛变行为，并且对于他们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做出了决议，实际上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的队伍。而仍然留在第一国际中的另一些工联主义者，则以约翰·黑尔斯为代表，继续顽固地坚持着反对爱尔兰人民斗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

七十年代初，爱尔兰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国际的许多爱尔兰支部相继建立起来。工联领袖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对此十分仇视。1872年3月，爱尔兰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请求英国工人组织给予援助。然而当时担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书记和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书记的工联领袖约·黑尔斯，不仅完全拒绝支持，而且千方百计地阻挠国际爱尔兰支部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斥责了他的这种错误立场。在5月1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黑尔斯企图迫使会议通过决议禁止建立爱尔兰支部，要加入国际的爱尔兰成员服从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他还竭力宣扬什

---

<sup>①</sup> 即《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03—404页。

么国际和爱尔兰争取解放的斗争没有共同之点的谬论。恩格斯在发言中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黑尔斯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只要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还存在，要求爱尔兰工人接受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是对他们的侮辱。黑尔斯要爱尔兰工人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87页）他指出，“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而黑尔斯的建议就“等于在国际内部实行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同上，第87、88页）恩格斯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斗争，他认为，各个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应当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自己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恩格斯的有力斗争使会议否决了黑尔斯的建议，挫败了他的沙文主义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同工联主义者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在就爱尔兰问题同工联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后来，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列宁选集》第2卷第553页）

### 关于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同工联主义领袖斗争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于，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组织是由贯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总委员会来领导呢，还是由推行改良主义路线的工联主义者来领导？

从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起，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为了抵制和清除工联主义在英国工人群众中的不良影响，加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正确领导，就开始超越工联组织，直接与英国广大工人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第一国际在英国各地的所有支部也都直属于总委员会，而没有另外成立国际英国联合会。但是，工联主义领袖参加国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国际为他们单纯、狭隘的经济斗争服务，即在他们需要举行罢工时，利用国际的组织去阻止英国资本家在别国招雇工人。国际成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积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各国工人群众，一再挫败了英国资产阶级以招收外国工人来破坏本国工人运动的阴

谋，给予英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以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工联主义者想要把国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工联组织的企图却始终未能得逞。因此，他们就以不让“外国人”领导英国工人运动为借口，大肆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总委员会，竭力鼓吹建立国际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以便由他们来控制国际在英国各地的支部，在整个英国工人运动中推行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工联主义路线。马克思、恩格斯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马克思指出：唯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这就使它成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杠杆；同时，英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缺乏“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0页）因此，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把国际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权交给工联主义者，就会使总委员会丧失这个伟大的杠杆，这显然是“愚蠢”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同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粉碎了工联主义者的阴谋。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各国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坚持长期的政治斗争，以便为未来的革命聚积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使英国工人群众更广泛地参加政治活动，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斗争，那些老工联主义领袖已逐渐丧失了自己在英国无产阶级中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日益为更多的工人所接受，国际在英国的组织不断发展，并且在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忠实于国际的工人领袖；这就使将成立的联合会委员会有可能遵循总委员会的路线开展活动。因此，根据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建议，于1871年10月，由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工联的代表正式组成了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但是，以窃据国际总委员会书记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的约翰·黑尔斯为首的一伙工联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在这个联合会委员会中拼凑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宗派小集团。他们竭力使联合会委员会同国际总委员会分庭抗礼，继续图谋夺取国际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权。在1872年7月21日于诺定昂举行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黑尔斯之流就向以马克

思、恩格斯为首的总委员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为了摆脱总委员会的领导，反对总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们以所谓加强“团结”为借口，提出并企图强行使会议通过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有权超越总委员会直接同所有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联系的决议。在黑尔斯的支持下，一伙工联主义分子在大会上无理要求限制总委员会开除违反国际共同章程和原则的支部的权利，他们还企图煽动各个支部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修改”马克思制定的共同章程，并且妄想把联合会委员会从伦敦迁到曼彻斯特去。但是，大会支持总委员会进行反对改良派的斗争，黑尔斯等人的图谋没有得逞。在此之前，黑尔斯就在总委员会中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多数委员闹对立，公然支持在美国被开除出国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制造种种障碍阻挠海牙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同黑尔斯之流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7月23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在调查结束之前暂时解除他的总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建议，有力地打击了他背叛国际的卑鄙活动。

然而，黑尔斯仍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他就盗用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同巴枯宁分子相勾结，疯狂地反对海牙代表

大会的决议，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他还在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用纯粹无政府主义者的陈词滥调，鼓吹所谓的支部“自治”。黑尔斯之流的这些无耻行径，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中拥护总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各地支部的强烈谴责。在妄图控制整个联合会委员会的阴谋失败之后，黑尔斯一伙就在联合会委员会中正式制造了分裂。1872年12月10日，他们向各支部发出了一个所谓“通告”，公开号召不要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擅自决定于1873年1月在伦敦召开联合会紧急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在英国的组织坚决反对了黑尔斯及其一伙的分裂活动和篡权阴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中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忠于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委员们，把黑尔斯之流清除了出去。作为合法的联合会委员会，他们取得了几乎所有支部的支持，并且同当时已经迁到纽约的国际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工作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有效的指导，恩格斯还经常帮助他们起草各种文件、报纸通讯，向他们介绍国际在各国中的状况。

为了反击以黑尔斯为首的工联主义者对国际的进攻，1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在致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国际先驱报》编辑的一封信中，驳斥了黑尔

斯盗用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对他们所进行的造谣和诬蔑,并指出其“目的在于损害整个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16页)对于黑尔斯宣扬的“自治”的口号,他们有力地揭露道:“这位突然装扮成争取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的战士的黑尔斯先生,实际上把这种自治理解为他个人的专横独断。”(同上)这一天,马克思还会见了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应他们的请求起草了告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以批驳分裂派的所谓“通告”。在这个呼吁书中,马克思证明,黑尔斯一伙实际上是同臭名远扬的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他严厉谴责了他们对待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两面派行为,因为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上,黑尔斯及其同伙都曾经投票赞成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且在决议上签了字;而现在,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大肆反对同一个决议。在驳斥黑尔斯之流对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决议的攻击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想说,没有他们这伙人的席位的总委员会无权代表国际。实际上,正是这个决议粉碎了他们攫取第一国际最高领导权的企图。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应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sup>①</sup>的请求,针对黑尔斯一伙的“通告”,起草了该支部致英

国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同样有力地痛斥了黑尔斯之流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无耻诽谤，强调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推翻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企图这样做，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处境恰恰就是这样。”（同上，第224页）这两个呼吁书给了工联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黑尔斯等人在1873年1月初，又发出一个所谓“新通告”，妄想为自己的丑恶行径狡辩，并向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反扑。对此，马克思在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起草的答复中，进一步揭穿了他们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同时指出：这个“新通告”除了企图用人身攻击、诽谤和撒谎来蒙蔽群众之外，根本没有驳倒上述两个呼吁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点。

1873年1月26日，黑尔斯一伙在伦敦召开了他们的所谓“代表大会”，再次重弹他们诬蔑总委员会、攻击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老调，并且成立了一个冒牌的“联合会委员会”。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联主义者的这次会议的结果完全是“一场惨败”，因为这个可怜的“大会”的参加者总共只有十个人，“他们甚至不敢说

---

① 第一国际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成立于1872年8月，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流亡工人中的国际会员。

出,他们冒名代表的是哪些支部”。(同上,第350页)他们在英国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衰竭,以至除了黑尔斯个人的少数追随者之外,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信徒。至于他们那个短命的“联合会委员会”,“除了自己的成员之外,不代表任何人”,它“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演这出滑稽剧,最后终于寿终正寝了”。(同上,第517页)黑尔斯本人也在1873年5月30日被总委员会开除出了国际的队伍。工联主义者妄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第一国际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英国的阵地。这就表明,经过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终于战胜了工联主义。

## 七、反对巴枯宁主义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出身俄国贵族，他的父亲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他本人在青年时代也曾当过沙皇军队的军官。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俄国、甚至使其贵族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巴枯宁被卷入了这股潮流，并结识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巴枯宁前往德国留学。在此期间，他受到蒲鲁东主义、魏特林的宗派密谋思想等各种思潮的影响。为此，沙皇政府决定取消他的贵族称号，这就使他获得了冒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英雄”的政治资本。1844年，巴枯宁认识了马克思。由于当时他的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马克思、恩格斯曾耐心地对 him 进行帮助和教育，然而巴枯宁根本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在1848年革命中，他大搞冒险主义的政治投机，疯狂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并竭力鼓吹沙皇政府为对外扩张而炮制的极端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革命失败以后，巴枯宁被捕，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

等地被囚禁过几年。1851年，他在监狱中向沙皇写了“忏悔书”，成了可耻的叛徒。1857年，巴枯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当时的西伯利亚总督是他的亲戚，他在那里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并干着向沙皇献媚、甚至充当反动政府迫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的帮凶的罪恶勾当。1861年，巴枯宁因乞求沙皇赦免未遂，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逃出流放地，经日本、美国到达欧洲。1862年，就在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革命的时候，巴枯宁著文狂热地吹捧沙皇及其反动政策。1864年，他在伦敦见到马克思时，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并伪善地表示愿意为国际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即前往直利活动。在那里，他不但不宣传国际的革命原则，反而极力宣传一套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凶恶的敌人。

巴枯宁主义是一个在极端革命的叫喊掩饰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巴枯宁主义者宣扬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是国家而不是雇佣劳动制度，号召立即废除一切国家；他们胡说财产继承权是私有制的基础，鼓吹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他们要求个人绝对自由，攻击一切集中、纪律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竭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更加危险的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施展了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策略。他们是



一伙野心家、阴谋家集团。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尚未形成，工人运动还很不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逐步兴起，却已经迫使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成为在社会上毫无希望地到处游荡、根本找不到出路的游民无产者。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破了产的小私有者绝望的心理和破坏一切的倾向。另一方面，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迅速巩固、壮大，有力地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推动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府。这就使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把第一国际看成是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要摧毁这个强大的革命堡垒。巴枯宁阴谋集团在第一国际中所进行的分裂和破坏活动，恰恰适应了欧洲反动统治阶级的这种需要。因此，巴枯宁集团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其凶恶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同他们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斗争直接关系到第一国际的生死存亡。

## 一个混入国际内部的 反革命阴谋集团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说巴枯宁“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在意大利的时候，巴枯宁就曾搜罗一帮流氓无产者，组织了一个名为国际兄弟同盟的秘密团体。1868年7月，他在费了几年时间观察形势之后，加入了国际的日内瓦支部。但不消几天工夫，在10月，他背着国际总委员会又在瑞士成立了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作为同盟的核心并严格控制着同盟的全部活动的，是极为秘密的国际兄弟会，它由巴枯宁的少数亲信的亡命之徒组成。同盟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一出世，巴枯宁就向国际总委员会提出，要求让它在保存自己的纲领和全部组织的情况下作为集体成员加入国际，企图以此来夺取日益壮大的第一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立即识破了他的诡计，揭露他企图“把工人运动放在俄罗斯的领导之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164页）恩格斯也说，这是“俄罗斯人的阴谋”，“我以为最好是安静而坚决地攘

弃他们”。(同上,第166页)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断然拒绝了巴枯宁的要求。马克思在决议中指出,如果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这“**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这个决议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的阴谋。

然而,巴枯宁分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不久之后,他们就改变花招,向总委员会表示愿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加入国际,但希望保留自己的“理论纲领”。这个纲领是个什么货色呢?恩格斯在谈到它的时候,曾无比较轻蔑地说:“**比这种理论的纲领更可怜的什么东西,我从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166页)马克思指出:“**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1),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因此他把巴枯宁称作“**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同上,第2卷第304页)

1869年3月9日,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写的给巴枯宁同盟中央的复信中着重指出,同盟纲领第二条中

宣扬的“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同国际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是互相抵触的；“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同上，第283页）他说明，同盟只有在放弃纲领的第二条，解散自己的组织，并把每个新支部的地点和人数通知总委员会之后，才能加入国际。

但是，巴枯宁及其一伙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实际上却把同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终于钻进了第一国际。这个秘密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罪恶的企图：要么就夺取它的最高领导权，使之成为巴枯宁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彻底毁坏它。为此，他们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策划了种种反革命阴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怒不可遏地痛斥他们说：“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为了混进第一国际，他们曾使用最美妙动听的言

词来赞颂马克思、恩格斯，赌咒发誓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在1868年12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巴枯宁就这样虚情假意地说过，“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关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可是，当他们在国际中的阴谋活动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反对之后，他们就以无比的疯狂，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最恶毒、最无耻、最下流的人身诽谤，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加以粗暴的歪曲和野蛮的攻击。

在他们满以为能够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有兴趣地要求尽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而篡权的阴谋一旦破灭，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图谋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事务性机构，变成所谓的“通讯统计局”或者“邮箱”。

他们的信徒少得可怜，为了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制造虚假的多数，推销自己的货色，他们每次都采用卑鄙的手段，妄图从根本不属于国际的乱七八糟的团体中搜罗“代表”，伪造代表资格证，甚至把大批空白的代表证带到大会上因找不到人选而作废。

他们大吵大嚷地反对“权威”，要求“自治”；然而

在他们所控制的国际组织中却实行着巴枯宁的个人独裁，专横地践踏各个支部的民主权利，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打击一切不同意巴枯宁主义的教条的支部和革命者，甚至任意把他们开除出去。

他们在口头上比谁都起劲地叫喊“团结”；然而他们却指使自己的喽罗潜入国际的各个组织，在其中建立秘密的小集团，按照巴枯宁之流的命令，拚命煽动分裂，并在事后倒打一耙，把制造分裂的罪名强加给对方。

他们大肆宣扬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然而当总委员会派人调查同盟在国际中所进行的罪恶活动的时候，他们竟然指使其死党武装袭击总委员会的代表，妄图杀人灭口。

巴枯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使第一国际面临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

### 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斗争 和巴枯宁派的猖狂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巴枯宁集团在国际中的活动时曾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

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他们正是这样领导第一国际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胜利的斗争。

秘密同盟一混进国际，巴枯宁就狂妄地提出，必须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马克思把这看作是对国际的挑战，因而积极准备同他们作斗争。1869年7月20日，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从理论和策略方面深刻地批判了废除继承权的口号。在8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他又宣读了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把这个报告提交巴塞尔代表大会。此外，马克思还起草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一系列决议，为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指导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同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

巴塞尔代表大会在1869年9月举行。巴枯宁妄图通过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使大会接受关于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口号，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强加给国际；然后以这种所谓理论上的“胜利”，迫使原先的总委员会成员辞职，并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巴枯宁派势力较大的日内瓦，从而达到由他来操纵整个国际的领导权的目的。为此，他们一面散布谣言，污蔑总委员会，竭力破坏它的威信；一面处心积虑地妄图控制代表大会。马克思曾揭露说：“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

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约姆先生<sup>①</sup>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但是，他们在大会上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之后，总委员会的代表随即宣读马克思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彻底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马克思在这个报告中说明，财产继承权是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法律上层建筑，它只是私有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继承权也就会自然消亡，而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导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他强调指出：“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因此，巴枯宁主义的这一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5页）马克思的这一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代表大会拒绝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胡言乱语，挫败了他们以自己的谬论取代国际的革命纲领的企图。

巴塞尔大会还通过了扩大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授予它吸收或拒绝新的团体或支部加入国际，以及在

---

<sup>①</sup> 吉约姆，巴枯宁的死党，后来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开除支部的权力。由于当时巴枯宁主义者还在做着控制总委员会的迷梦，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反对这一决议，甚至还觉得它不够。但是，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原有的成员组成总委员会，连巴枯宁本人也未能挤进这一领导机构；大会还决定总委员会继续设在伦敦。这就完全粉碎了巴枯宁集团篡夺国际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巴塞尔大会之后，巴枯宁主义者因自己的可耻失败而恼羞成怒，开始公开地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利用当时被他们控制的《平等报》、《进步报》，放肆地诬蔑、攻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他们反对国际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反对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支持拉萨尔分子，胡说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拉萨尔派也属于国际，并诬蔑总委员会助长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分裂。巴枯宁还在瑞士各支部中强制推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任意把一些违背他的教条、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支部开除出去。

为了维护国际的革命事业，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回击了巴枯宁主义者。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批准了他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逐条批驳了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的种种诽谤。他指

出，由于英国在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英国工联主义者控制下的英国工人运动缺乏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的直接的坚强的领导才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他指出，只有支持爱尔兰人民的独立斗争，才能有力地打击英国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才能加强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英国的社会革命。他还指出，李卜克内西所属的爱森纳赫派是属于国际的，而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拉萨尔派根本不属于国际，这个宗派组织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

接着，马克思又在3月28日的《机密通知》中，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中所干的种种阴谋勾当。他指出，“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他强调说明，巴枯宁及其一伙的罪恶活动的目的是妄图把国际“变为自己的工具”。（同上，第304页）这个文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起了动员人们警惕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并起来同它展开斗争的重大作用。

同时，国际在日内瓦的组织也采取措施，迫使巴枯宁分子退出《平等报》，并任命了新的编辑人员，从而把这个报纸从巴枯宁手中夺了回来，成为国际在日内瓦

同巴枯宁集团作斗争的重要阵地。

1870年4月，在瑞士拉绍德封召开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采取阴谋手段，拼凑了一个虚假的多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公开制造分裂，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设在拉绍德封），同设在日内瓦的坚持国际路线的原联合会委员会相对抗。他们还抢先向总委员会写信，把分裂的责任推给对方，并要求总委员会承认它。马克思十分清楚巴枯宁以此夺取国际在瑞士的领导权的险恶用心，在6月2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他谴责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支持原联合会委员会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并使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决议。决议规定，保留日内瓦委员会的原有职权，并建议巴枯宁派的拉绍德封委员会另外采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这个决议击破了巴枯宁集团在瑞士的篡权计划。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拒绝服从这一决定，于是总委员会便与拉绍德封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此后，巴枯宁及其一伙变本加厉地攻击总委员会的所谓“专断”和“权威主义”，掀起了一股分裂和破坏国际的逆流。由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吸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主要注意力，因此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暂时退居次要地位。

## 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发展和胜利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巴枯宁主义者先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提出什么“拥护法国，反对普鲁士野蛮人”的荒谬口号。而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他们又大肆玩弄冒险行动。1870年9月，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建立了公社革命政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初，一切都顺利。……但是蠢驴们——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73页）他们颁布的废除国家的法令，瓦解了工人的革命力量，断送了这次起义的成果。

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主义者一面同欧洲各国反动派一起恶毒地污蔑公社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它的英雄们；一面利用第一国际在各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围攻下所处的困难境遇，更加狂热地策划分裂和破坏国际的阴谋。为了揭露并粉碎巴枯宁派的险恶活动及其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1871年7月25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召开秘密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sup>①</sup>。这一建议被通过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

---

<sup>①</sup>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马克思随即推荐他担任总委员会委员，并在10月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起草了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

9月17日至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领导并主持了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他们在会议上无情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者拒绝一切政治的教条，驳斥了他们关于参加政治运动就等于承认现存社会制度的胡言乱语，论证了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强调“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7页）打击敌人。恩格斯指出，所谓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同上，第446页）他揭露巴枯宁分子反对政治斗争的目的在于破坏国际，并把工人阶级推入资产阶级政客的怀抱。在嘲笑那些一面叫嚷放弃政治、一面却无耻地自命为“革命家”的巴枯宁主义者时，恩格斯说，“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同上，第449页）同时，也只有运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手段，才能达到最终消灭阶级的目的。代表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明确地提出了在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他们在这个决议中指

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同上，第 455 页）这个决议不仅对于打击巴枯宁主义者，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巴枯宁秘密同盟活动的发言，强烈谴责了它分裂、颠覆国际的罪行。为了打击巴枯宁阴谋集团，马克思、恩格斯还向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决议草案并获得通过。关于国际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有力地斥责了设在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的假联合会委员会，号召在它控制下的各支部的工人重新加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如果这种联合暂时不能实现，这些支部应定名为国际汝拉联合会，同巴枯宁派的假委员会划清界限。针对巴枯宁派的宗派分裂活动，代表会议关于取消各组织宗派名称的决议规定，“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1 页）针对涅恰也夫在巴枯宁指使下假冒国际名义在俄国所干的许多破坏革命的勾当，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同上，第 457 页）的特别决议。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狠

狠地戳穿了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诡计，撕下了他们冒充革命者的假面具。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曾经说过：“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页）

伦敦代表会议之后，巴枯宁及其一伙拚命加紧他们破坏国际的卑鄙活动。1871年11月12日，他们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了自己的所谓“代表大会”。这个可怜的“代表大会”总共只有“代表”九个支部的十六个人出席，然而他们却煞有介事地向国际的各联合会发出通告，疯狂地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无耻地咒骂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气势汹汹地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实行“支部自治”。

面对巴枯宁集团的猖狂进攻，马克思、恩格斯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在一系列书信、文章中从各个方面揭露、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反动理论和阴谋活动。马克思指出，所谓巴枯宁主义只不过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而对巴枯宁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他还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抛弃巴枯宁主义的那套放

弃政治的胡说，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同上，第396页）恩格斯在批判桑维耳耶大会的通告时愤怒地指出，它所宣扬的关于否定一切政治、权威和纪律的论调，旨在剥夺工人阶级手中的斗争武器，妄图使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畏缩胆怯、阿谀奉承并且“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9页）的早期基督教徒的组织；他斥责他们的分裂活动是在直接为以暴力手段迫害国际的各国反动势力效劳。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集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他痛斥那些否认任何权威和集中的巴枯宁分子，“要末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末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恩格斯还着重揭示了巴枯宁国家学说的反动性，他说：“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



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行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同上，第400页）

1872年1月至3月，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发到国际所属的各联合会。在这个文件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及其一伙的破坏活动。他们说明巴枯宁的同盟的纲领“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页）揭露它敌视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宗派主义本质；并强调指出，在各国反动派疯狂迫害第一国际、工人阶级特别需要团结一致地奋起斗争的时候，巴枯宁主义者却起来反对总委员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为了瓦解整个国际工人协会，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

这个通告发出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为海牙代表大会作积极的准备工作。8月6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草案。他指出，正是疯狂污蔑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到处鼓吹“支部自治”的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

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29页）总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文件，从而在国际全体会员面前揭露了巴枯宁派在国际内部所进行的罪恶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还起草了打击巴枯宁集团的一系列提案，并向总委员会指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将要进行的斗争的主要任务和策略。同时，他们还领导总委员会对巴枯宁及其一伙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阴谋活动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帮助这些国家的先进工人识破巴枯宁分子的真面目，把他们团结到总委员会的周围。所有这一切，保证了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的胜利。

1872年9月，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次大会是同巴枯宁分子的决战，它对国际的命运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而亲自前往出席主持。在大会上，他们同反对总委员会以破坏整个国际的巴枯宁派的阴谋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马克思指出，维护总委员会的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痛斥了巴枯宁分子企图把总委员会变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事务性机构的荒谬主张，说明这样做将使国际的领

导权落入资产阶级分子的手中。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大会排除了少数巴枯宁分子的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进一步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并把它列入国际的章程。同时,恩格斯在代表总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中,彻底揭露了巴枯宁及其信徒采用两面派手法在国际中所犯下的种种反革命罪行。他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了把同盟的首要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去的决定。

海牙代表大会是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毁灭性打击,它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同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海牙代表大会后的斗争

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巴枯宁主义者继续在作垂死的挣扎。1872年9月15日,他们在瑞士的圣伊米耶召

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狂妄地宣布“否决”海牙大会的决议，建立他们的“反权威主义”的“国际”，并无耻地自称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代表”。1873年，巴枯宁还抛出了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敦促总委员会作出决议，把那些不肯悔改的巴枯宁分子和由巴枯宁控制的组织从国际的队伍中清除了出去。同时，他们还写了《政治冷淡主义》、《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对巴枯宁的反动理论作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透彻地揭示了巴枯宁主义者放弃政治斗争的口号的反革命实质及其对工人运动的严重危害。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就必须夺取政权，为此，他们就应该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而巴枯宁分子鼓吹拒绝政治的“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0页）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嘲笑了巴枯宁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要求“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恩格

斯指出,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即使要使工厂开工生产、火车正常奔驰、轮船安全航行,也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即需要权威。在斥责巴枯宁分子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的谬论时,他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因此,叫嚷反对一切权威的人如果不是散布糊涂观念,那就是故意背叛无产阶级运动;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学说时,着重揭露了他反对无产阶级国家、鼓吹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后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在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之后,“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

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恩格斯则运用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绝不能废除国家、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而是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否则，“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恩格斯根据他们在187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荒谬性和反动性。他指出，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巴枯宁主义者就不得不抛弃他们关于放弃政治之类的原则，并且参加纯粹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政府；

在采取实际行动时，他们的“极端革命的叫喊”就会变成“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9页）而在他们所控制的起义城市中，由于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无限制地分散了斗争的力量，从而使反动政府得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城市一一征服；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同上）

187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部重要著作，对于五年来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作了光辉的总结。他们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全面地彻底地揭露了巴枯宁及其一伙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手段，在第一国际内部，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俄国等地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有力地证明了巴枯宁集团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死敌，“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这一著作的问世，使巴枯宁及其一伙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喧嚣一时的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日益孤立、日益遭到工人群众

的唾弃，猖狂一时的巴枯宁本人不久也终于混不下去而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 \* \*

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英国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国际会员和各国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欧美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先后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和组织；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如德国的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法国的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等，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参加人数越来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



## 八、反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

德国统一实现之前，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在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路线和策略，大大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前进。经过普法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以后，一方面，德国党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在党内逐渐滋长起来，有时甚至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对革命理论的忽视，他们往往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冒牌社会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由于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已经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工人政党的活动对于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捍卫德国革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 反对妥协投降，清算拉萨尔主义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阶级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上的原则争论也已成为历史；于是，实现两派的合并、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则上都赞同合并。但是，由于拉萨尔派的领导人一面顽固地死抱住拉萨尔主义的教条不放，一面却大肆叫嚷“团结”，妄图依靠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来维持自己在工人群众中日益衰落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爱森纳赫派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迫使对方抛弃拉萨尔的反动纲领，使统一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上。早在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就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然而，李卜克内西等人却不听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放弃原则，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统

一，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了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草案。

马克思、恩格斯在见到这个纲领草案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是“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同上，第4页）而《哥达纲领》却是一个“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同上，第31页、第3页）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等人参与炮制这样的纲领，就是令人不能容忍地“拿原则来做交易”，就是向拉萨尔派“无条件投降”；（同上，第4页）而这将给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马克思在1875年4月至5月初所写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对这个纲领作了详尽、深刻的批判，对长期以来危害德国工人运动的拉萨尔主义作了全面、彻底的清算。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哥达纲领》关于“劳动”、“社会”和“劳动的解放”等空洞说教的荒谬性。马克思指出，离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个根本问题来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必将导致劳动者不占有生产

资料就可以创造一切财富的荒唐结论，从而掩盖资产阶级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工人的事实，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页）而应该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创造的条件，使工人能够而且必须推翻这个社会。恩格斯指出，《哥达纲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胡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同上，第4卷第415页）马克思还指出，这个纲领之所以提出这些内容错误、逻辑混乱的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同上，第3卷第7页）

马克思透彻地分析批判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以及“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等错误观念。他指出，在社会总产品中必须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后备基金、管理费、公益金等等，然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因而就决不是什么“不折不扣”，而是“有折有扣”。他指出，所谓“平等”、“公平”都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实际上就是消灭阶级，离开这一点来讲什么“平等”只

能是欺人之谈；而《哥达纲领》的起草者用这些“陈词滥调”、“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就是对革命的极大犯罪。他还批驳了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说明一定的分配方式总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从这种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就会认为不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实行所谓“公平的分配”，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庸俗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这些谬论的时候，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学说。他指出，在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而这些弊病“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同上，第11、12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

需分配！”（同上，第12页）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地斥责《哥达纲领》在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不攻击大地所有者，斥责它接受了关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拉萨尔主义的口号。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同上，第8页）特别是在德国，容克地主在国家政权中还占着主要的地位，他们是极端的反动派，因此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必须反对地主阶级。他说明，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和小资产者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所以他们也是革命的。因此，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谬论，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粗暴歪曲，而这“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同上，第14页）恩格斯也指出，李卜克内西等人一面在纲领中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一面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是“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这就使自己陷于荒唐的自相矛盾的境地。

马克思、恩格斯强烈谴责《哥达纲领》的起草者追随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指出，纲领中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它只是空喊所谓“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而资产阶级为了开展自由贸易所鼓吹的也正是这个口号。因此，他说：“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页）恩格斯也怒不可遏地斥责道：“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同上，第27—28页）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气愤地痛斥《哥达纲领》抄袭了拉萨尔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因为拉萨尔的这一谬论，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的。马克思指出，当关于工资的科学理论已经在德国工人政党内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的时候，现在这个纲领竟然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他指出，“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同上，第17—18页）接受他的“铁的工资规律”，就不得不一起接受他的论据——马尔萨斯的“人

口论”<sup>①</sup>。而这种反动理论是赤裸裸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并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的。恩格斯则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同上，第28页）

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抨击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谬论。马克思把它讽刺为“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并且辛辣地嘲笑说，《哥达纲领》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从“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同上，第18页、第18—19页）他指出，这是用拙劣的空话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同上，第19页）恩格斯也愤怒地指

---

<sup>①</sup>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反动的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他的所谓“人口论”诡称，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因此，他主张用战争、贫困、瘟疫和繁重劳动等办法来限制人口繁殖，使之与生活资料相适应。



出,《哥达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就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同上,第29页)地把社会主义降低到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着重地揭露和批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他们指出,这个纲领不提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却提出了拉萨尔的争取所谓“自由国家”的口号。马克思说:“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同上,第19—20页)恩格斯也说,所谓“自由国家”,只能是指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也就是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因此,提出争取“自由国家”,纯粹是胡说。他们揭露,纲领侈谈所谓“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抹煞国家的阶级性,把国家当做超阶级的组织,当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针对拉萨尔之流的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暴力镇压的工具。马克思指出,当时欧美一切形式的国家“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同上,第20页)都是资产阶级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而拉萨尔主义者所崇拜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同上，第 21—22 页）也就是说，它是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的原理，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他们也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同上，第 22 页）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获得解放。而纲领竟按照拉萨尔的腔调，宣扬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国家中可以仅仅依靠所谓“合法手段”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的谬论的时候，光辉地阐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伟大理论，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第 21 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需要建立的国家，决不是什么“自由

的人民国家”，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自己的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机关，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同上，第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是对拉萨尔主义的决定性打击，它对于指导德国工人运动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李卜克内西等人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一面利用它对纲领草案作个别词句上的修改，一面却对这种批判本身进行抵制和封锁，并且于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个机会主义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纲领草案时表示，在合并大会通过这个纲领之后，他们将公开发表声明，表明他们与上述纲领毫不相干，毫无共同之点。后来，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它的敌人都对《哥达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他们才决定对它保持沉默。

两派的合并虽然使德国无产阶级因为有了了一个统一的政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广大工人群众

的战斗团结和斗争信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但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因此,机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便不断地在党内表现出来。不久,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在党的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那些趁着两派合并的机会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竭力“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同上)从而给党的巩固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杜林。

###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欧根·杜林(1833—1921)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七十年代,他进一步宣扬折衷主义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无耻地把自己的“体系”标榜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在德国党内的影响,特别是利用党内某些领导人如莫斯特、伯恩施坦之流的支持,组成了一个宗

派小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875年以后,杜林对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的特别猛烈的攻击,已对德国工人政党的理论基础造成严重威胁。杜林的反动思想的出现,同当时德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密切相关的。面对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德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不断受到冲击的反动统治,在拚命加强暴力镇压措施的同时,竭力企图用各种庸俗的折衷主义的思想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以求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杜林的反动思想,正是适应了德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这种反革命需要。同时,它也是那些混进党内而又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害怕激烈的革命斗争,总想调和阶级矛盾,妄图以自己的面貌和愿望来改造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反映。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保证年轻的德国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1876年5月,恩格斯决定接受李卜克内西一再提出的请求,准备公开回击杜林的猖狂进攻。5月24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了这种打算;第二天,马克思就立即回信坚决支持,他说:“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评杜林。”(《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500页)于是,恩格斯毅然中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用两年时间写成了《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

的变革》即《反杜林论》这部伟大著作，全面地、彻底地粉碎了杜林的反动思想。

由于杜林的反动“体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极其广泛的理论领域，因此，恩格斯在批判它们的同时，就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的联系。

在哲学上，杜林虽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并且时常谈论唯物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但实际上他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因此处处都暴露出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谬论。杜林的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剖析这种哲学的时候，彻底批判了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

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存在着所谓“存在形式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这些“原则”的应用，因而应该适应于这些原则。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反动观点时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

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恩格斯首先揭露了杜林的自然观的先验主义的本质。他指出，杜林在把他的先验原则应用于自然界时，得出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存在、物质世界可以离开时间和空间而存在、运动可以和物质相分离等等谬论，并且“不得不再把有意识的行动，即把普通话中叫做上帝的东西，暗中赋于自然界”。（同上，第75页）恩格斯处处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杜林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证明：世界的存在只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同上，第83页）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同上，第91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同上，第98、99页）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恩格斯就不仅批驳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而且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基本原理。

杜林在把他的先验“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时，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提出了关于永恒的、绝对不变的真理、道德、平等的观念，和完全自相矛盾的自由观。

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认识是一个从有限向无限不断发展、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思维的至上性和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都只能在人类生活的无限的延续中才能完全实现；这就驳倒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接着，恩格斯把这种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应用于社会历史，针对杜林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说明道德观念与平等观念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因而都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彻底粉碎了杜林的先验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在批判杜林关于自由的胡言乱语时，恩格斯科学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上，第134、146、153页）

杜林在他的反动哲学中，还拚命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它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并从根本上否定矛盾的存在。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证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同上，第160页）的著名论断。他还指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同上，第181页）它同



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给杜林的反动哲学下结论的时候，恩格斯无情地嘲笑道，“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杜林，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他的所谓“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同上，第185页）

杜林的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也遭到了恩格斯的毁灭性的打击。

杜林认为，社会经济规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因而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恩格斯透彻地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由于人类社会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和交换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第186页）

恩格斯揭露：杜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暴力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政治暴力是第一性的，经济关系是第二性的；政治暴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只是由于这种暴力破坏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才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因此，暴力是该诅咒的、绝对坏的东西。在批判这种反动的暴

力论时，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他指出，私有财产和阶级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剩余产品之后才产生的。他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同上，第199页）因此，不是政治暴力产生私有制和阶级，因为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而是私有财产产生阶级和政治暴力，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着政治暴力的性质。恩格斯还针对杜林把暴力看成是绝对坏的东西的谬论，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反动剥削阶级手中的暴力起着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而革命阶级手中的暴力则“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同上，第223页）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丑恶嘴脸，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接受他的那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同上，第224页）

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诬蔑和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他深刻

地分析批判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它的全部内容就是：劳动进行生产，暴力进行分配。从这种把生产与分配截然隔裂开来的“分配决定论”出发，杜林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应该保留，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坏的，应该消灭。因此，杜林的政治经济学起着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杜林把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看成是暴力作用的结果，从而把这个问题由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认为它仅仅是非正义的；因而人们只要等待正义的胜利就行了。这就揭露了杜林的经济理论是彻头彻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针对杜林的这些谬论，恩格斯强调说明，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它武装了工人阶级，使他们懂得，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

最后，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指出，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不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他的所谓“普遍的公平原则”基础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此，杜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社会”的计划，只不过是头

脑中编造出来的反动的乌托邦。

杜林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分工“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中，这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针对杜林的这些反动思想，恩格斯指出，在保存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分工的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也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同上，第333页）恩格斯指出，连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已充分了解到旧式分工的危害，要求把消灭城乡对立作为消灭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因而，承袭了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拘泥于城乡分离与旧式分工的狭隘观念的杜林，甚至和他们比较起来，“也还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同上，第332页）恩格斯还证明，消灭旧的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并不是幻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这一切就会逐步得到实现。

杜林说，在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公社中，分配按照“普遍的公平原则”来进行，即“以等量的劳动交换等量的劳动”，使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经济

公社的成员可以任意处理自己的金钱，并保留财产继承权，他们之间的交换则通过金属货币来进行。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经济公社纯粹是一种空想，因为让生产者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就使用来维持和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基金积累只能掌握在私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公社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公社自身的崩溃。同时，由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收入，由于存在着可供储存的金属货币，就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得以积蓄钱财，另一些人则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积蓄钱财的人就会变成高利贷者，他们借助于流通手段就会变成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因此，杜林的“共同社会”，“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末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同上，第344页）显然，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资本主义。

恩格斯还从国家、宗教、家庭、教育和婚姻等方面，有力地批判了杜林的“社会主义”。杜林认为，在他的“共同社会”中，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可以“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应当继续存在；由于“立法和

司法”及“防卫”的需要，军队、警察、宪兵和律师都一样必不可少；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它依然是拥有财产的单位。这样，杜林就是妄图把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中现有的一切，都丝毫不加改变地保留在他的“社会主义”中。因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杜林的所谓“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同上，第337页）罢了。

恩格斯对杜林的致命批判，曾遭到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拚命反对，他们甚至在1877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在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连载这些论文。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党内的先进分子的坚决斗争，他们的这种阴谋未能得逞。《反杜林论》彻底摧毁了杜林的反动思想，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理论武器。

### 反对“非常法”时期的机会主义

1878年10月，德国俾斯麦反动政府为了加紧镇压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悍然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up>①</sup>，强行查禁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报刊。党的领导对于统治阶级的这种打击毫无思想准

<sup>①</sup> 全称为：“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

备，因而惊惶失措，几乎使党处于瓦解状态。一部分窃取了党的领导职位的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不顾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人的反对，竟然宣布解散党的组织。就连倍倍尔等人也一时发生动摇，不能辨别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李卜克内西甚至在国会的演说中声称服从这一反动法令，公开表示社会民主党反对暴力革命，是“不折不扣的改良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严厉申斥了他们抛弃原则的思想，要求他们起来同机会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迅速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地下刊物，针锋相对地回击敌人的进攻。只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情批评和广大党员群众坚强革命意志的有力推动，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才逐渐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

当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是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即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瑞士苏黎世以党的名义出版的刊物上，他们抛出了露骨的投降主义的纲领。他们鼓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它不应以暴力革命吓跑资产阶级，而应该使运动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他们甚至无耻地宣称，反社会党人法是党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的，因而党应该

向政府忏悔、乞求，表明自己愿意在它所允许的范围  
内活动，从而使俾斯麦自动取消这个法令。

“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激起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极大愤慨。1879年9月17—18日，他们给倍  
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写了一封著名的《通告信》，  
对“苏黎世三人团”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恩  
格斯揭露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是小资产阶  
级的代表，面对敌人的打击，他们“不是采取坚决的政  
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  
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  
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  
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  
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  
样的断语来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  
领的实质是，企图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置于“有教  
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冲淡、削弱和  
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用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补补缀缀的改良取代党的革命纲领，从而  
完全取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政  
党来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针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谬论，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绝不当等待“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的“恩赐”，“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同上，第374页）他们绝不当把自己的运动局限于改良的、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必须坚持党的阶级斗争的纲领，通过革命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绝不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而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同上，第371页）马克思、恩格斯说明，如果党企图取消阶级斗争，以温和驯顺的态度去乞求俾斯麦废除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要上当的正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还指明党对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阶级中的人所应采取的态度是，“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同上，第373—374页）而对于那些混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冒牌货”，党必须准备同他们分裂。

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严厉批评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这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调和、纵容态度。他们尖锐地指出：“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同上，第368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论述了他们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原则立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同上，第374页）他们严正声明，如果党的领导人继续容忍党的机关报采取适合于“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立场，他们将公开表示反对，并结束同他们的团结一致。

9月19日，马克思又在给左尔格的信中猛烈抨击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言行。他指出，“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他们只“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9页）

马克思、恩格斯还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凯泽尔在整个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演说，为反动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揭露这个法案是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指出凯泽尔向俾斯麦献媚的背叛行径，“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同上，第374页）同年10月，社会民主党国会会议员的报告公然宣称，党要争取反动统

治阶级的“同情”，反对任何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恩格斯在11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中，痛斥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谬论。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取那些本身就是恶棍的人们的“同情”是十分荒谬的；而反对任何战争实际上就是否定革命战争这个为达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必须采取的手段。他批判了“博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说明，“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0页）针对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议员始终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同上）

对于同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不力的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给以严肃的批评。他们深刻地说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机会主义在党内滋长起来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党的某些领导人“已经十分‘议会化’了”，“已患了议会迷病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04页，第391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党的领导迁就机会主义者凯泽尔的行为时尖锐地指出，他们把国会党团的决议看成是不容违背的宗教教义，不准人们公开批评，是十分错误的；“一个政党

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同上，第90页）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敦促党的领导“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同上）起来同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涌入党内，并企图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党，是机会主义思想流行起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告诫党的领导人，要永远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时刻注意同这些人的思想和愿望作斗争。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

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同以莫斯特为代表的一小撮“左”倾机会主义者作了无情的斗争。莫斯特之流完全否认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必要性。他们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故意公开地大吵大闹，大肆诽谤党的领袖，竭力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别有用心地把党内的斗争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他们借此贩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拚命鼓吹“愚蠢的密谋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7页）而这一切只能对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有利。马克思彻底

揭露了莫斯特一伙的真面目，指出他们主办的《自由》杂志，“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同上）他们宣扬的那一套货色，纯粹是“无稽之谈，它是那么愚蠢，那么荒谬，那么庸俗，以至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只能说明约翰·莫斯特的极端爱好个人虚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0页）马克思还指出，莫斯特之流的无耻喧嚣，“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同上，第449页）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整个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最高领导之下”。（同上，第387页）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斗争，使莫斯特的小集团除了在一小撮败类中间之外，在德国党内和工人群众中找不到什么市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严肃批评和原则斗争，帮助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袖克服了思想上的动摇，并很快组织全党转入秘密状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来掩护党的革命活动，积极地采取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并在瑞士创办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勇敢地 and 敌人开展斗争。1880年8月，德国党在瑞士的维登召开了第一次地下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莫斯特等人开除出党，并对《哥达纲领》作了一点重要修改，以使用“一切手段”取代“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党的目的的提法。从此，党就走上

了基本上同新的形势相适应的道路。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有力的斗争，没有公开指名地谴责伯恩斯坦等人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大会以后，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国会党团为据点，时常抬头；特别是1884年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很大胜利、国会党团的人数大为增加之后，机会主义者更是企图把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一面积极帮助和指导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策略，批判机会主义思想；一面要求党的领导人加强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他们过去一直把党的报刊和宣传作为自己获取黄油的“奶牛”，“非常法”的实施使他们因失去稿酬的来源而变得垂头丧气，因此他们把一切希望都集中于温顺驯服、摇尾乞怜地哀求反动政府废除这一法令上。他号召一切革命者“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恶意”；而要采取坚定的革命策略，“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

个打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斗争。针对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活动，恩格斯坚决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国会中要不断地揭露政府为统治阶级利益效劳的反动政策，经常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各种法案。他反复提醒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袖，注意警惕这些机会主义议员向政府作原则性的让步，强调同他们作斗争的重要性，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的彻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他还指出，由于“非常法”的存在，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应采取首先尽可能地孤立机会主义者，然后迫使他们退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的策略。

1884年，当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主张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有利于统治阶级殖民主义政策的法案时，恩格斯立即写信予以痛斥，批评党的领导人对他们采取的调和态度；大力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起来反对他们的这种背叛行为。机会主义者对党中央机关报的反对十分恼怒，便企图把它置于国会党团的控制之下。恩格斯又及时揭穿了他们的这种阴谋，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国会党团保持独立。他还指导党的领导人发动群众与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者开展斗争，在党报上大量刊登党员群众和地方党

组织的来信、决议和文章，批判、声讨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行径，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为了摧毁右倾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影响，恩格斯还从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宣扬国家是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的谬论，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着重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他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而“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针对机会主义者鼓吹的通过议会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普选制只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同上，第169页）

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追随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竭力宣扬所谓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此，恩格斯写了《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光辉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区别。他批判地分析了黑



格尔哲学,指出辩证法的方法是其“合理内核”,唯心主义的体系则完全是反动的东西,同时说明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克思如何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改造他的辩证法并使之与唯物主义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恩格斯提出了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标准,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在阐明这一点的时候,他不仅批判了把精神看作物质的本源的唯心主义,而且着重批判了康德和休谟等人鼓吹的不可知论。在剖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来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时,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它们都是以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一切现象,都是用形而上学的即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客观世界,都没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恩格斯通过对贯穿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费尔巴哈宗教观、伦理学的分析,深刻地批判了唯心史观。他还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详尽阐述了社会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根本上粉碎

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的这些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活动，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工人群众，促使他们在同反动统治阶级英勇斗争的同时，积极反对党内的、特别是国会党团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将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解除党内的一切职务或开除出党，从而保证全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在“非常法”时期，不仅没有溃散、削弱，而且胜利地冲破了反动政府疯狂迫害的罗网，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 九、反对美、英、法等国工人 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其他的思想体系，欧美各国纷纷建立起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些党还不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们并没有能够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划清界限，和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也缺乏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还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因此，它们或者处在鼓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或者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这些党所存在的各种错误，热情帮助、具体指导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开展斗争，为把这些党引上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作了不懈的努力。

## 反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美国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德国侨民，其中除了以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1906)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许多是拉萨尔分子。1876年，他们建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这个党的领导对美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大都不通晓也不学习美国通用的语言，仅仅限于在德国侨民的狭隘的小圈子中活动；他们企图把连他们自己也往往不能正确理解的理论强加给美国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并且借口美国工人及其组织在理论上的落后，而拒绝同他们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拒绝参加他们的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有了飞速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深化，到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美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它的成分又相当复杂，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工人之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侨民工人，而本地工人又有黑人与白人之分；随着美国

广阔的西部领土的开发，大批工人不断西迁，工人群众的组织很不稳定。这一切都给本来就富有长期统治经验的美国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队伍、破坏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一面大肆宣扬沙文主义思想，挑起本地工人与侨民工人的矛盾；一面收买少数工人贵族，竭力散布阶级调和等改良主义的谬论，鼓吹阶级斗争只是欧洲的现象，妄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孤立和扑灭社会主义运动。因此，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还不成熟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而它的出现又恰恰符合了美国资产阶级对抗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

早在1871年，马克思就向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强调了反对宗派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他说明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治运动就是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因此，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

中产生出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固然以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为前提，但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因此，他要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美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

马克思逝世以后，随着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更加重视反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给左尔格等人的大量书信中，恩格斯不断地批评这个党的领导，指出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对包含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是“行动的指南”；（同上，第459、456页）绝不应该把它从外面生搬硬套地强加给美国的工人群众，而应该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它去指导工人的革命斗争，并引导工人群众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掌握这种理论。

针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拒绝接近一切不接受他们的教条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宗派主义错

误，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和劳动骑士团等主要工人组织的状况，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对它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他指出，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了运动的事实，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个运动起初摸索前进，笨手笨脚，没有明确的目的，好象什么也不懂，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扩大，这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他斥责了对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些暂时性的缺点加以讽刺、嘲笑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指出：“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他又说，美国工人群众“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39页）恩格斯还指出，劳动骑士团作为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虽然还没有正确的纲领和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但是它仍然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是把美国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458 页) 他们必须深入到这个组织中去进行工作, 在这些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组成一个核心, 以便同其中的改良主义的领导进行斗争, 掌握它的领导权, 推动它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恩格斯指出: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 不管怎样组织起来, 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同上, 第 456 页) 他严厉批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脱离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而“只有一个虚名”。(同上, 第 261 页) 恩格斯说明, 它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 就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 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 而应当主动地向美国工人群众靠拢。因此, 他号召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要认真地学好英语, 走出自己的侨民的狭小圈子, 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恩格斯还指出, 在运动中,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 一旦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 (同上, 第 458 页) 这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出发和前进要重要得多。他要求这些社会主义者在斗争实践中向美国工人群众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 认真地帮助工人群众从自己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所遭到的每一次失败中总



结经验教训,逐步使他们懂得,“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同上,第457页)恩格斯无比恳切地告诫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说,由于他们具备了欧洲长期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要是他们能克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真正投身美国工人群众的运动,对运动有所帮助,或是促使它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也许会大有用处,并在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要是袖手旁观,他们就会退化成一个教条主义的派别,被人看做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撇在一边了”。(《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但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辜负了恩格斯的教导和期望,它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的拉萨尔分子的控制下,不仅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而渐渐成了美国工人阶级斗争发展的“最坏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39页)

### 反对法国“可能派”的机会主义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对革命工

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迫害，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到七十年代末，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日益加深，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激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也由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为工人的革命活动带来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因此，法国的工人运动重新开始高涨，并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879年，茹尔·盖得（1845—1922）和保尔·拉法格（1842—1911）创立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春，他们在伦敦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拟制党的纲领，马克思亲自为他们口授了理论性的总纲部分。同年11月，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党纲。马克思认为，这个纲领“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它唤醒了“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1页）

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增强，使法国资产阶级深感自己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为了分裂和破坏工人运动，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工人运动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早先混入工人运动的一些老机会主义者，也力图利用再度高涨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切都必然要

在法国工人党内反映出来。因此，法国工人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十分清楚，他们认为，“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1页）因而口头上声称接受党的纲领的马隆、布鲁斯与盖得、拉法格之间的暂时的合作是很自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也没有为他们的伪装所迷惑，没有幻想他们同革命派的合作能长期维持下去。他们坚信，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嘴脸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那时，通过同他们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必将得到锻炼，受到教育，更好地成熟起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密切注视着法国工人党的活动，经常给盖得、拉法格等人以亲切的关怀和具体的指示。为了在法国工人群众中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提高识别机会主义者的能力，恩格斯还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编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先在法国出版发行。这本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于推动法国工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一样，马隆、布鲁斯一伙很快就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他们公开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的党的革命纲领，否定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宣扬什么应该把党的斗争仅仅局限在所谓“可能”争取得到的狭窄范围之内（因此被称为“可能派”）。他们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出了各地党组织“自治”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他们认为党的纲领中的革命要求会妨碍党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鼓吹给予各个地方组织任意制定自己的纲领以“适应”当地情况的权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宗派分裂活动，竭力要把法国工人党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妄图使它变成实现自己的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

为了把法国工人党培育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也称为“盖得派”）反对“可能派”的斗争。马克思揭露了马隆、布鲁斯之流的谬论对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危害性，并把他们痛斥为“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71页）恩格斯也指出，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

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3—434页）

在1882年9月于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要尽种种卑鄙的伎俩，操纵多数，制造了公开的分裂。盖得、拉法格等革命派的代表退出这个大会，在罗昂另行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宣布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产生的革命纲领是党的一切组织的统一的、必须遵守的纲领，并把马隆、布鲁斯等“可能派”的头目开除出党。而留在圣亚田的机会主义者则另组了一个新的“可能派”的党。他们按照自己的改良主义的路线，完全取消了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批准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党的地方组织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国工人党的这次分裂，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两个互不相容的因素分开了，因而是一件好事。恩格斯指出，马隆、布鲁斯之流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出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牺牲了运动的阶级性质，只有同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促使他们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无原则地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他说：“在可能

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恩格斯还及时从法国工人党的分裂中深刻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同上，第434、432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坚持原则，不怕分裂，坚决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加强了对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的支持和指导，经常在斗争的策略上给他们以具体的指示；而且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亲自参加了对“可能派”的斗争。分裂发生之后不久，恩格斯就揭露：马隆和布鲁斯“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同上，第431页）他们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

却保留了巴枯宁的斗争手段。他们在筹备圣亚田代表大会时所使用的正是巴枯宁的撒谎、诽谤、阴谋诡计等一整套旧策略。他说明，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政党内，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是必然要遭到毁灭的。

恩格斯在批判“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时指出，由于他们推翻了党的革命纲领，并使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特殊目的随意制定自己的单独的纲领，他们就彻底抛弃了党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取消了其中的一切正确要求；因此，“这个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同上）恩格斯轻蔑地嘲笑它说，这个所谓的党从此可以同蒲鲁东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同流合污，成为一锅“革命稀粥”。

由于分裂的结果，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在人数上是减少了，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远见指出：“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同上，第434页）他指出，“可能派”在圣亚田的胜利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是不可能长久

保持下去的，马隆、布鲁斯之流很快就会彻底完蛋；他们不敢出席盖得派关于两个代表大会的辩论会，就证明了他们在本质上是多么虚弱。相反，革命的组织一定会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壮大，通过革命宣传工作，它们的影响也必将迅速增长。

马克思、恩格斯还号召其他各国工人政党同“可能派”划清界限，支持以盖得、拉法格为代表的法国革命派的斗争。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驻巴黎的记者，错误地把圣亚田派称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立即写信予以驳斥，并严肃地向他们指出，“可能派”在一开始就象英国的工联主义者一样，“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同上，第435页）他还指出，“可能派”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激进派欺骗工人，为他们捞取选票，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的背叛。

在支持盖得、拉法格等人反对“可能派”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尖锐地批评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策略不够灵活的错误，指出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毫无根据地渴望行动”。（同上，第432页）由于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大力帮助，法国工人党坚持进行了反对“可能派”和各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斗争，它在法国工人群众中的革命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盖得本人最后却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 反对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 宗派主义和“费边社”的改良主义

从八十年代开始，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广泛传播，又推动英国的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正在逐步丧失工业的垄断地位，但它在对外贸易等方面依旧占优势，特别是它所霸占的殖民地还在扩大。这就使它得以继续从巨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钱来收买工人贵族，破坏工人运动。这一时期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仍然同英国资产阶级这一反动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宗派主义必然使社会主义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斗争而失去力量，改良主义则势必要把工人运动引上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邪路。它们从不同的方面适应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都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2）等人在1881年创立了英国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海德门等人执行了一条宗派主义的路线，他们借口工联组织的反动性而拒绝在其中进行工作，始终把自己置于英国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标榜自己拥护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把它变成僵死的教条；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迷恋于争夺领导地位，海德门本人就是一个剽窃马克思的著作并把它庸俗化，以求猎取个人名利的无耻之徒。因此，这个组织不仅未能推动英国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反而成了它的绊脚石。

马克思、恩格斯同海德门等人的宗派主义路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还在民主联盟刚成立后不久，马克思就揭露它是“由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各种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而它的领导者海德门等人的目的则是为了“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9—240、240页）恩格斯也指出，海德门一伙“是破坏一切的政治野心家”，（《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84页）“是撒谎者和骗子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4页）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小集团装扮成一个有影响的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在工人群众面前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

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意义。

恩格斯严厉批判了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者无视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斗争、只顾在自己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恶劣态度。他说明，由于他们不关心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人们谁也不跟他们走，因此他们搞来搞去只能是一个纯粹的小宗派。他辛辣地把这个组织比作是只有军官而没有士兵的军队，嘲笑它活象1849年德国巴登地区起义中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一个上校，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一个士兵。在群众面前，他们似乎彼此一致，而在暗地里却愈来愈严重地闹纠纷，甚至还发生公开的争吵。他指出，这样的组织根本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只能被拿着钱袋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所收买。

恩格斯还斥责了海德门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庸俗化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指出，他们虽然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只是把马克思的发展学说歪曲为死板的教条，他们认为这些教条不是工人可以由他们自己的阶级情感得来的，而是必须当作一种信念毫无发展地马上生吞下去的。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这就是社会民主联盟“始终只能成为宗派，而且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317页）

恩格斯认为，海德门之流和他们所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因此，他积极支持以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55—1898)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1851—1898)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联盟内部反对海德门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并且在1884年秋天退出这个组织，另行创立了社会主义同盟。同盟成立初期，艾威林夫妇等人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遵照恩格斯的指示，推动它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使它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这个同盟成立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就钻了进去。同盟的多数领导也对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虽然恩格斯曾一再要求他们注意“眼前发生的、外部的活生生的运动”；警告他们“必须把无政府主义分子驱逐出去”，否则就会“把整个事情弄糟的”；（《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95、220页）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没有被清除出去，反而逐渐攫取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这样，社会主义同盟也就变成了英国工人运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艾威林夫妇等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就离开了它。

此后，恩格斯一方面更直接地面向英国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帮助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工联主义者的控制。他向工人群众指

出，仅仅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不可能导致工人阶级状况的根本改善，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奋起参加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而要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就不仅需要把目前的工会变为群众性的战斗组织，而且必须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他反复教导一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正确地掌握革命理论，努力把它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应该正确地对待工人群众和他们的运动，相信他们会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相信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将会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号召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有独立的阶级纲领的、英国工人的党。这件事要是成功的话，会迫使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退到幕后活动，这是解决当前争论的最好办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220页）艾威林夫妇等人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在伦敦最下层的码头工人中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推动了八十年代后半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同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同时，恩格斯还尖锐地批判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费边社”是1884年由英国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织的团

体。它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然而仅仅从它用公元前三世纪以缓进待机、避免决战著称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绰号为“孔克达特”——缓进者)的名字来命名，也就可以看出它的机会主义的本质了。费边社分子竭力引诱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主张通过细微的改良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恩格斯指出，“费边社”“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3页)费边社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懂得社会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强大力量的威胁。他们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妄图把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从而避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剧烈的革命将给他们造成的危险，并借助于由他们控制的工人运动来实现自己个人的政治欲望。因此，恩格斯称他们是“一伙野心家”；并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费边社分子有时也让几个工人进入他

们的领导机构，但这只是为了掩盖这个团体的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性质，为了蒙蔽广大工人群众，诱使他们跟着自己走。恩格斯揭露了费边社分子这种伎俩的欺骗性，说明被他们选中的那些工人在其中只能永远扮演少数派的角色，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警告各国革命者不应当被这种做法所迷惑。

费边社分子口头上也大肆鼓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通过革命的道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全社会所有；他们热衷于用各种感情上的说教去“感化”资本家，诱导工人群众等待百万富翁的恩赐。他们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自治的地方行政机关，然后逐步扩大它对某些公用事业部门的所有权，使社会主义“一点一滴地”实行起来。恩格斯把他们的这种假社会主义称为“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并且揭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他指出，费边社分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1页）他还指出：“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要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

费边社的机会主义的政治策略也遭到了恩格斯的

愤怒批判。恩格斯指出，费边社分子不是把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而是去同他们联合，妄图依靠把自己的候选人塞给自由党的办法来使他们当选，结果只是使自己蒙受了自由党人的愚弄和欺骗。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英国工人群众奋起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采取自己的独立行动时，费边社分子却拚命劝说他们继续做自由党的尾巴，因此他们实际上就是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起着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恶劣作用。恩格斯还指出：“费边社的手段和卖身求荣的议员们的花招是完全一样的：金钱，倾轧，名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3页）

恩格斯不仅自己对英国的费边派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而且严肃地向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党的领导人指出，“掩饰就意味着共谋”，（同上，第442页）要求他们起来公开地揭露它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面目，从而使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受到教育。



## 十、第二国际创立初期恩格斯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解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等方面，作了长时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推动下，欧美各国工人的革命洪流，冲破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疯狂镇压，迅速地奔腾向前；到八十年代末，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革命派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然而他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 反对机会主义者篡夺国际工人 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时，以法国的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机会

主义者，妄图利用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愿望，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国际工人组织，从而把日益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1888年11月，他们参加了英国工联主义者在伦敦召集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委托“可能派”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发起”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一个国际工人组织。

为了彻底粉碎机会主义者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六十八岁高龄的恩格斯立即“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页）他同欧美各国工人领袖进行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向他们指出“可能派”所进行的活动将给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造成巨大的危险，号召他们抓紧时机，立即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地同“可能派”机会主义者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组织。在恩格斯的鼓励和支持下，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决定发起召开同“可能派”的会议相对抗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成立革命的国际组织。1889年2月，各国工人党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在荷兰海牙举行了会议，正式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一定的筹备工作。

海牙会议前后，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能够战胜和压倒机会主义者的会议，恩格斯进行了紧

张而又热烈的活动，无情地揭露、批判了“可能派”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本质。他不断地向对“可能派”的真面目还认识不清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发出警告，说明“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现任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2页）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代理人；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彻底抛弃调和主义的态度，迅速同马隆、布鲁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对于同“可能派”斗争相当坚决、但有宗派主义倾向的盖得、拉法格等人，恩格斯则反复告诫他们要学会灵活的斗争策略，尽量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参加自己发起组织的大会。他指出，在同“可能派”作斗争时应注意做到：或者是迫使他们同意我们的主张，这样我们就攻下了他们的阵地，永远打破了他们想以独一无二的被公认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身分出现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拒绝我们的主张，那么我们就掌握了优势，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从而使一切犹豫不决的人都站到我们一边来。恩格斯还向各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们阐明：关于建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的问题使人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第226页)他还指出,这一场激烈的斗争实际上是第一国际内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的继续,“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而策略也还是过去那一套。”(同上,第222页)因此,恩格斯谆谆教导他们要坚持原则,努力把预定的代表大会开好。

在同“可能派”作斗争的同时,对于充当“可能派”帮凶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者海德门等人,恩格斯在伦敦亲自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敢嚣张。他还时常注意揭露某些机会主义者借口与“可能派”搞好“团结”以破坏大会的准备工作企图,批评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可能派”的调和主义态度,并亲自对那些打算出席“可能派”会议的人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恩格斯这一系列的斗争,是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成功地召开、第二国际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胜利地建立的有力保证。

1889年7月14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并决定把5月1日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

日，同时宣布第二国际正式成立。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召集的会议，则完全被这次大会的革命声势所压倒。恩格斯因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未能亲自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展。当大会就对待“可能派”机会主义的态度问题进行原则性的争论、而李卜克内西等人却采取了含混不清的折衷态度时，恩格斯对他们作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在合理的条件下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惜任何代价地高喊同“可能派”联合，那就是一种欺骗行为。由于“可能派”的拒绝，大会终于抛弃了联合的幻想，并与之实行决裂。对此，恩格斯感到很满意，他说：“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在谈到这次代表大会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的时候，恩格斯异常兴奋地指出：“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同上，第242—243页）

但是，第二国际内的成分十分复杂，一方面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拒绝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否定一切

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鼓吹冒险主义策略的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它的领导者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时由于错误地夸大了议会斗争的作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钻了空子，而且他们本身的右倾思想也日益滋长，以致到九十年代右倾机会主义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恩格斯顽强地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同时更着重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英勇斗争。

### 反对德国党内的“青年派”

第二国际成立初期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恩格斯一贯地、坚决地支持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这一斗争。同时，他还对这个派别在德国党内的代表“青年派”集团作了无情的批判。

“青年派”是1890年初德国反动政府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在党内最终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小集团。它的主要成员是一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他们无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客观形势的变化，鼓吹冒险主义的策略，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党参加议会选举，攻击党的领导机关执行机

会主义路线、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还胡说自己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

恩格斯彻底揭露了“青年派”集团盗用他的名义造谣撞骗的极端无耻的行为。他着重批驳了他们反对一切合法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策略，说明他们企图轻率地采取行动只是一种“幻想”，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他还说，“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

“青年派”的代表人物为了给自己的冒险主义策略寻找理论根据，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硬说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对此作了详尽的批判，指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同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同上，第477页）在批判“青年派”的谬论的时候，

恩格斯反复地、全面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归根到底是社会前进的决定性条件；但是，经济因素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历史总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和历史斗争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尖刻地嘲笑了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青年派”分子，他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同上，第476页）

恩格斯还严厉地痛斥了“青年派”分子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恶劣作风。他指出，这些家伙们极端无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有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然而他们竟然想要规定党的策略！他们刚从资产阶级的大学里出来加入到党的行列中，就自以为有某种特权可以指挥无产阶级群众，并要求党给予他们以名利和地位，这是十分可笑的。他还说，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恶劣的习气，都在“青年派”分子的身上冒了出来，这一切对于党都是极其有害的。针对他们热衷于充当“领袖”的“自大狂”，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他们所受的资产阶级“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他们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相反地，他们必须对这种教育加以深刻的自我批判；



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除了需要有理论知识以外，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并且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同上，第270页）

在恩格斯的支持下，倍倍尔等人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青年派”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战胜了他们。在1890年哈勒代表大会上，“青年派”的首领曾表示放弃自己的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然而他们并未实践自己的诺言。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党把这个宗派集团的一些头目清除了出去；而另一些顽固分子则公然与党闹分裂，示威性地退出代表大会，从而自动地脱离了党的队伍。

### 反对德国党内的“议会主义”

在“非常法”期间，由于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德国工人运动冲破了反动势力的疯狂迫害，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1890年1月，德国政府被迫废除了这个反动的法令。此后，适应着反动阶级改变统治手法的需要，党内出现了一个以福尔马尔、格

里林伯格等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他们狂热地吹捧反动统治阶级的这一举动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新方针”，胡说容克资产阶级政府能够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他们公开宣称“以全部精力”“毫不含糊地反对暴力的革命”，竭力宣扬通过议会道路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歪曲党为宣传和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正当的议会斗争，鼓吹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策略完全对立的、彻头彻尾的议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还严重地侵蚀了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不仅考茨基、伯恩斯坦支持它，就是李卜克内西也经常谈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且把一切主张暴力革命的人都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倍倍尔都认不清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面目，并且经常为之辩护。这就使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气焰十分嚣张。

德国党内的这种严重的危机，使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上。1890年3月9日，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他反对任何情况下的和任何形式的暴力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说明，没有一个敌人会因为我们的反对暴力革命而放弃自己的反革命暴力统治，因而这种思想只能使革命者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还指出，如果认为凡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人都是“无政

府主义者”，那就是把马克思和他也都划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同年10月，在恩格斯的督促下，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德国党的哈勒代表大会决定拟制新的纲领以代替旧的《哥达纲领》。恩格斯考虑到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将严重危及党的理论基础，而如果德国党的纲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就会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和前途都遭到恶劣的影响；因此，他提出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提议遭到了德国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和许多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哥达纲领》的起草者李卜克内西、《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茨基等人的阻挠和反对。恩格斯同他们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他认为，《哥达纲领批判》是有关重新制订党纲的讨论的文件中最重要文件，再延迟发表这一文件，就未免是一种犯罪行为。针对机会主义者对拉萨尔的迷信，他指出，拉萨尔的虚假声誉是依靠剽窃和歪曲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而造成的，“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7页）恩格斯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十分坚定的意图”。他对德国党的领导人说，

“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页）如果《新时代》拒不登载，他就要在维也纳发表它的全文。在恩格斯的强大压力下，1891年1月底，考茨基被迫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这一光辉著作。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狂怒和愤恨。他们甚至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和议会讲坛上，公开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思想。于是，恩格斯决定再一次迎头痛击他们的顽固的机会主义立场：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时，他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并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观点，阐明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对这些经验所作的精辟总结的伟大意义。他强调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该象巴黎公社的革命工人一样，不仅要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而且必须彻底炸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新

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去代替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巩固自己所争得的统治地位。这就最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反对暴力革命、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谜”。恩格斯还严词痛斥了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上）

不久之后，德国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它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仍然存在着不少原则性的错误。为了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并使党的纲领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891年6月中、下旬，恩格斯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痛击了那种“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0、119页）论调。

在这篇重要著作中，恩格斯除了对纲领草案的导言和经济要求部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一系列错误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之外，着重批判了它的政治要求部分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恩格斯首先指出，纲领草案“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 272 页)即没有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说明,在德国这样一个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制国家中,皇帝和政府拥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和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它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建立民主共和国应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政治要求。否则,即使纲领中的所有要求都能如愿以偿,也不能达到这个主要的政治目标。恩格斯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之所以不敢在党纲中提出用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政体,而宣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目的的机会主义思想,原因就在于害怕反动政府重新恢复刚刚废除了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恩格斯在驳斥这种“和平过渡”的谬论时指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他还指出,机会主义者鼓吹这种幻想“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同上,第 274、第 273 页)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强调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用暴力来“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

制度的桎梏”。(同上,第273页)德国党的领袖们在拟制纲领草案时还放弃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要求;因此,恩格斯在揭示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时着重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同上,第274页)他还说明,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必然要把党引入迷途,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认识模糊、意见分歧,从而给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莫大的损失。

恩格斯为反对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这些有力的斗争,极大地教育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在1891年10月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就党的策略问题作了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正确地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此必须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决议还强调,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革命的策略。大会通过的纲领虽然还存在未提无产阶级专政、也未提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重大缺点,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可以认为

也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批判。但是它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必然性，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大会除同“青年派”集团作了胜利的斗争之外，还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使福尔马尔及其一伙陷于孤立。因此，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爱尔福特纲领》时高兴地说：“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0页）

同时，恩格斯也充分估计到了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顽固性。就在上述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在谈到福尔马尔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就清楚地指出，此人要比那些“青年派”分子“危险得多，他更狡猾，更能隐忍，好虚荣达到了发狂的地步，不顾一切地渴望充当某种角色”。（同上）因此，恩格斯始终警惕地注视着福尔马尔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活动，随时揭露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向德国皇帝和统治阶级献媚、要求社会民主党同反动政府“合作”等机会主义言行的本质。他十分重视帮助工人群众认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经常向他们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



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他还不断地要求倍倍尔等党的领袖更坚决地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尽快地和他们决裂。

### 反对法、德两党在农民 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法、德两国的大批农民遭到破产，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同时，法、德两党在合法斗争中取得的一些成就，也促使他们产生了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愿望。因此，法国工人党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和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都讨论了农民问题，制定了土地纲领。然而，在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问题上，他们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法国党为了在农民中捞取选票，竟然在纲领中提出了维护农民的私有制的主张，甚至对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也答应予以保护。福尔马尔则宣扬，应该收买包括富农在内

的全体农民，他援引法国党的南特纲领，并公然捏造说这个纲领曾得到恩格斯的同意和支持，妄图以此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制造虚假的理论根据。

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声明、一系列书信和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愤怒地驳斥了福尔马尔的谣言和诡辩，深刻地批判了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的基本原理作了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列举事实严正地说明，他就法国党南特纲领所发表的意见同福尔马尔所说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他在原则上是反对这个机会主义的土地纲领的。恩格斯指出，法国党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在南特纲领中答应保护农民的财产私有制，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的原则的。他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加快这个过程；但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2页）他又说，“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同上，

第 293 页)对于南特纲领所宣扬的应保护那些剥削短工的佃农的谬论,恩格斯更为尖锐地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人就站到同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因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向佃农作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一种背叛的行为。

在批判福尔马尔关于农民问题的机会主义观点时,恩格斯直接了当地把他斥为叛徒,因为他提出的所谓收买全体农民的政策是“甚至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同上,第 512 页)其实质在于维护那些拥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雇农和短工的富农的利益,维护农村中现存的剥削制度。恩格斯指出,如果按照福尔马尔之流的政策要把那些富农也争取过来,那就必须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因此,恩格斯坚决要求倍倍尔等人同福尔马尔之流彻底决裂。当倍倍尔遵照恩格斯的指示起来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而李卜克内西竟然表示不同意、并为福尔马尔辩护时,恩格斯立即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右倾思想。他尖锐地责问道: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零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

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同上，第 514 页）

针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恩格斯阐明了正确对待农民问题、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夺取政权，工人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去，在农村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他还详尽地分析了农村各阶层的状况，说明贫苦的小农是党应该依靠的重心。为了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就必须同大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冒充农民的朋友的“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同上，第 296 页）同时还必须同小农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作斗争，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恩格斯认为，农村中的无产者即农业工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能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周围，就会使整个德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在农村中必须首先维护他们的利益。恩格斯对中农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明，对于剥削别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部分中农，以及比这些中农更厉害地剥削雇工和小农的大农，无产阶级政

党绝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也绝不应把代表他们的利益的集团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至于大土地占有者，他明确指出他们是革命的对象。这样，恩格斯就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制定对农民的政策，指明了方向。

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是用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逐步把小农引上合作化的道路。

恩格斯对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批判，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第二国际内的、特别是法、德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思想。

\*                     \*                     \*

恩格斯对第二国际主要是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所进行的这些有力的斗争，保证了第二国际在其成立初期能够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进行活动，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在1895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以后，右倾机会主义者就逐步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的控制下，也逐步蜕化变质。伟大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以

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修正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阶段，开辟了通向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